

中國邊政

第五十八期

▲目 錄▼

帝國主義與蒙古·····	金 兆 鴻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簡介·····	莫 迪
俄帝赤化下的外蒙古·····	Victor P. Petrov 著 林 佩 音 譯
西域塵談(四)·····	羽 田 明 著 宋 念 慈 譯
蒙古王公世譜·····	柏原孝久著 烏尼吾爾塔譯
恰克圖市況商情回顧·····	沈 咸 恒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出版

帝國主義與蒙古

金兆鴻

蒙古地區，無論其為漠南內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及青海額魯特蒙古，其地為我中華民國領土，此為世所公認之事實；蒙古同胞，無論其為喀爾喀蒙胞、額魯特蒙胞、布里雅特蒙胞，其為構成我中華民族之一份子，固不僅為我中華民國政府之一貫主張，亦為世界各國政府所無從否認者，作為一個中國人，絕不願意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土內劃分勢力範圍，尤不願見我蒙古地區成為帝國主義者之勢力範圍，更不能容忍帝國主義者在我蒙古地區製造傀儡政權，陰謀削弱我國，威脅國家民族之生存，此蓋蒙古地區在我國國防體系上，實處於最重要之地位，昔時左文襄公曾云：「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何秋濤於唐努烏梁海則有：「金山劍海之間，古為用武之地，……所謂無形之金湯也」，近人於蒙古則有：「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區域，那就是蒙古，中國地形好像一個有蓋的水壺，東北是壺的柄，新疆是壺的嘴，蒙古却是壺的蓋。這個蓋蓋的好，中國全區沒有問題，這個蓋蓋不住，那麼全區的水都要受影響了，中國歷史上幾個大帝國的毀滅，……都顯然以失掉這個區域的控制為主要的原因，……現在已到空權時代了，地理上的形式，要另外換一個眼光來看，將來空運普遍之後，將顯然看出，文化和資源必集中於北半球……蒙古地區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據點，……今後地理形勢要以球形來看，那麼此處對於東，便成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區域了」（註），此實為一針見血之議論，足証其地位重要，唯其如此，我國為保持國家民族之生存，必須保持此一地區，也唯其如此，自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年）中俄訂定尼布楚條約以後，至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中俄訂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止，在此二百五十六年間，東西方亦自帝國主義者，無不想盡方法以侵奪或分化我蒙古地區，儘管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其最終目的則均為：將我廣大蒙古地區自我國挖走，故其必要步驟必為誘惑我蒙古同胞脫離我中華民族，其手段則無所不用其極，實集卑鄙無恥之大成，此兩百五十六年亦即我蒙古同胞為帝國主義者宰割之血淚史。

註：請參看「中國一週」一卷十期「亞洲地理上的領導區——蒙古」一文，該文未列作者姓名。

其所以造成此種悲劇，一方面固然由於蒙古地區地位重要及其地下資源豐富，引起東西方帝國主義者之覬覦；另一方面，實由於我國同胞對蒙古普遍缺乏認識，以致於無從產生一種妥切而合適之對蒙政策，不但如此，曩昔國家建設重點向以內地或沿海地區為優先，甚至有時做出極令蒙胞反感之事，如使用侮辱性名詞以稱謂蒙胞等，在此等情況下，蒙胞對中央之印象則為：「危不能救，困不能濟」，於是無形之中遂給帝國主義者以侵略分化之機會。及至民國

肇建，偉大之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先揭櫫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之空前政治號召，幾使帝國主義者對我蒙古地區之侵奪分化之陰謀無從下手，不幸先則由於軍閥割據，再則由於日本之全面侵略，最後則由於共產匪黨造反禍國，兵燹連年，終至神州陸沉，河山變色；使我國家對蒙古雖有建設之計劃與意志，却無建設之時間與力量；雖然由於我中華民國之肇建，已使國家對蒙古已有正確之認識，因而亦有建設蒙古之計劃與心志，然則一般國人對蒙古之認識，依然與遜清時代相似，停滯在誤解、漠視階段，但在此期間，東西方亦自帝國主義者却針對我政府開明政策，精研出更狠毒之分化手段，趁我軍閥割據、內亂頻仍之際，進行其分化我蒙古同胞之陰謀，本節擬就東西方亦自帝國主義者之諸端野心，如以武力侵奪我蒙古地區，在我蒙古地區製造傀儡政權，以及假學術為名，以分化我蒙胞脫離我中華民族等方式，加以敘述，以瞭解其梗概，亦所以促進國人對蒙古地區之重視。

一、帝國主義者侵奪我蒙古地區部份

我蒙古地區廣大，而自明末以迄，國家均未加以重視，而其時復正值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向外擴張之時代，及至清初，國力尚強，沿海地區因人口稠密暫保無虞，但蒙古地區，一則因人口稀少，滿清復採隔絕政策，再則因朝野對蒙古一無所知，以荒野地區視之，對其在國防上之重要性亦全無了解，遂啓他國侵奪強佔之野心，茲將其重大者敘述如次，

（一）布里雅特蒙古地區之被侵奪：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年），俄國強行侵入西伯利亞東部（註），此一廣大地區乃我布里雅特蒙古同胞之游牧地區，但中俄訂定尼布楚條約時，一則由於國人對蒙古史地之缺乏認識，再則又因無可資利用之地圖，三則因清廷所派訂約大臣竟與國人患同一毛病——對蒙古史地之缺乏了解，遂誤將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劃予俄國（按額爾古納河以東之地，現為蒙古呼倫貝爾部，與興安省西部在同一地區），於是布里雅特蒙古同胞遂淪為異國臣民，其後更由於俄國及蘇聯對布里雅特蒙古族人強迫實行侵略及毒化教育，使之成為俄國對外侵略滲透之工具，如民國八年，竟有二千餘武裝之布里雅特蒙古族人企圖滲入外蒙古，脅迫外蒙古就範，所幸外蒙古官府洞燭其奸，其事乃廢；雖則部份布里雅特蒙古族人受俄毒化教育而變質，但絕大部份布里雅特蒙胞，仍確知身為中國人，民國十二年，此時距俄侵奪此一地區已二百三十四年之久，布里雅特蒙胞中有那羅第戈爾者，深感俄共暴政既違背蒙古傳統文化，復難以忍受，遂聯合外蒙古肯特部蒙胞，揭竿而起，反抗異族統治，響應者多達二千餘人，並提出「打倒革命政府」、「復興清代（

即中國「蒙古」等口號，其嚮往祖國可見一斑；昔乎其時正值國內多事之秋，既不能給予實力支助，又不能給予有效之聲援，甚或對其抗暴義行漠不關心，徒使其義行成爲蘇聯屠殺我蒙胞之藉口。布里雅特蒙古地區，實爲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侵奪我蒙古之第一個地區。

註：按西伯利亞一詞，甚多學者認係鮮卑利亞之譯音，而利亞爲地方之義，故西伯利亞即鮮卑地方，換言之，鮮卑地方乃我國歷史上鮮卑族系生息之地，此說故尙待攷証。

(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及唐努烏梁海之被侵奪：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在阿爾泰諾爾附近，阿爾泰諾爾在唐努烏梁海正西阿爾巴爾山之西，清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俄國侵奪此一地區及烏梁海十佐領地（註），此即後日蘇聯衛拉特蒙古自治州之由來；此爲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侵奪我蒙古之第二個地區。

及至清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帝俄於誘脅我外蒙古獨立之同時，亦在唐努烏梁海施展同樣手法，至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俄共革命成功設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時，唐努烏梁海仍在舊帝俄餘孽控制之下，蘇聯非但不放棄帝俄時代之侵略政策，反更進一步組織「唐努烏梁海革命黨」爲組織，召開所謂「俄烏革命會議」，在此項會議中強迫唐努烏梁海爲蘇聯附庸，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在蘇聯脅迫下強行設立「土文蘇維埃自治政權」，按所謂「土文」，乃俄人對唐努烏梁海人之稱謂，亦即拓拔之音轉，同年底在所派唐努烏梁海調查員及極少數蘇聯軍隊到達時，唐努烏梁海同胞一致起而響應，一度宣告光復，然而不旋踵，大量蘇聯紅軍攻入唐努烏梁海，我軍不敵退出，烏梁海又爲蘇聯所控制，成立所謂「土文自治政府」，民國十四年改爲「土文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三年竟然予以併吞，由「共和國」降爲「自治州」，列爲蘇聯「領土」，此爲第三個以武力爲帝國主義所侵奪之蒙古地區。

註：按烏梁海十佐領之地，在阿爾泰諾爾（泊）之東，爲定邊左副將軍所轄。

二、帝國主義者在我蒙古地區製造傀儡部份

由於時代之演變，國際關係日趨複雜，以武力侵奪地，已難見容於近代國際舞台，於是侵略者遂改變策略，在我蒙古地區製造傀儡政權，其手法雖異，其目的則同，茲將其所製造之傀儡政權敘述如後：

(一)帝俄及蘇聯製造外蒙古「大蒙古國」及偽「蒙古人民共和國」：當遜清宣統末年，因派駐庫倫大臣三多氏欲辦新政，手段稍嫌激烈，以是蒙胞多不同意，其時我中國國民黨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國民革命已然爲全國國民所欣然接受，推翻滿清已是勢所必然之事，於是帝制俄國遂趁此時，利用外蒙蒙胞反對三多新政，蠱惑煽動外蒙王公活佛脫離我國，同時更利用外交手段，由俄駐北京大使郭索維慈（Korostovets）照會清廷：「如不停辦新政，俄

國斷不漠視……」，其實辦理新政與否，或如何辦理，概係我國內政，何勞他國過問？俄國之公然干涉我國內政，足証俄國對我外蒙古早已視爲禁脔，深恐外蒙一旦施行新政，清廷政令必然達於外蒙各階層，增進外蒙與中央之關係，進而影響俄國侵奪外蒙之機會，因此千方百計，橫加阻撓，若謂俄國此舉旨在厚愛蒙胞，則尙非常識不足，必係另有居心無疑。

然由於外蒙古係我領土，此乃世界各國所公認者，於是帝俄侵略主義者，遂變更方法，以誘脅，煽惑等方式，鼓動外蒙古王公活佛脫離我國，企圖製造「獨立」醜劇；稍後並派遣大量曾受俄國毒化訓練之布里雅特蒙古族人，偕入外蒙古，以增強其對外蒙古脅迫之實力，於是外蒙古遂在此「邪惡力量」下，演出第一幕（次）「獨立」醜劇；及至民國肇建，國父首創三民主義，揭櫫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之政治主張，引起舉世重視，而外蒙古蒙胞人心內向，均使俄國有所顧忌，於是外蒙古遂從「獨立」改爲自治，更由於我派駐庫倫大員二陳（陳錄及陳毅），均以幹練著稱，遇事處置得當，深受外蒙蒙胞、王公及活佛之歡迎，遂於民國八年自動取消象徵特殊之自治，重回祖國之懷抱，正在普天同慶之際，不幸俄國共黨革命成功，成立蘇聯政府，其對我外蒙古之野心，更甚於帝俄時代，而其手段尤爲毒辣，此時復值我國軍閥割據自雄，互不統屬，遂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先有白俄餘孽謝米諾夫（Semenov）舊部恩琴（Borov Fedor Von Irgens Stenbock）率領帝俄時代之殘兵遊勇，攻入庫倫，於是外蒙古遂在此一股強盜土匪刀槍下被其侵奪，不旋踵俄共在恰克圖後營子設立訓練班，美其名曰培植外蒙古青年，實爲灌輸共產毒化教育，冀圖藉以赤化外蒙古，其後在外蒙古偽政府當權之蘇赫巴圖及喬巴山等二十餘人皆其毒化產品，在俄共唆使下於民國九年四月初，成立所謂「蒙古人民革命黨」，由俄人操縱控制，同年七月俄共紅軍擊退恩琴，外蒙古遂陷入共黨之手，成立所謂「蒙古獨立國」之傀儡組織，其後改爲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爲蘇聯第一個附庸國；正當我國全力抵抗日本侵略時，偽「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其主子——蘇聯授意下，不斷向滇內、滇西及東北各部蒙古進攻，佔領不少地方，造成後日偽外蒙與上述各部蒙古之境界糾紛，抗戰勝利前夕，蘇聯頭子史達林、英國首相邱吉爾及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黑海北端之雅爾達簽定使眞理蒙羞、正義無光之雅爾達密約，出賣我外蒙古，論者每以羅斯福年邁昏庸，致墜史達林預設之圈套，其實不然，筆者認爲：邱吉爾及羅斯福此二西方自由世界強國領袖，眼見我國軍民在八年浴血抗戰中，所表現之團結，大出西方世界之預料，而視死如歸爲求國家統一自由之民族魂，亦使舉世震驚，深恐抗戰勝利，我國必將成爲世界第一流強國，尤將成爲亞洲第一強國，因此不願我國成爲廣土衆民之國家，必須使我國分裂不安，亦因此始同意蘇聯之要求，直言之，亦不過爲百年來西方政治家所遵行之「均勢」思想（Balance Power）而已；此爲帝國主義者在我蒙古地區所製造之第一個傀儡組織。

(二)日本製造偽「滿蒙政府」經緯：自我中華民國肇建後，不旋踵而各地軍

閩割地自雄，民國十五年今 總統蔣公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所向披靡節節勝利，不兩年即統一全國，日本深恐如不及時發動侵華戰爭，一旦中國強大，勢必失去此一「機會」，因此盡其所能在我國內各地製造派系滅人性之屠殺惡行，幸賴 蔣委員長洞燭日本之陰謀，深知當時我國力還不足以抵抗日本侵略，以是處處對日本忍讓，使日本陰謀無由得逞，俾便培植國力，於是日本遂迫不及待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在我東北發動震驚世界之「九一八事變」，設立偽滿洲國，在此傀儡組織中，將蒙古各盟部及特別旗分別設為偽興安東南西北四省，名為予蒙人以自治，實則全由日人幕後操縱，至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於漢南內蒙古之錫林郭勒盟、昭烏達盟等等蒙古各盟相繼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侵佔，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御用學者遂宣稱蒙古人非中國人，而與日本人同種，抹煞史實，於是極少數知識不足意志欠堅或私欲未遂之蒙胞王公，受其蠱惑，在日本軍閥刺刀指使下，設立偽「蒙疆政府」傀儡組織，所幸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傀儡組織首腦人物紛紛反正，該傀儡遂無疾而終。

三、帝國主義者對我蒙古之分化部份

時更勢易，國際「均勢」論調不但盛行於西方，即東方之帝國主義者亦莫不奉為圭臬，不但在我國蒙古地區製造傀儡政權，更進而分化我蒙古民族，曩者陰謀侵奪我蒙古地區或在我蒙古地區製造傀儡政權者，多為與我相鄰之各強國，但陰險分化我蒙古地區者，不僅與我為鄰之強國樂為之，即使與我毫無地理關係之各強國（甚或弱國）亦莫不樂為之，睽其目的實在為削弱而已，今特介紹如下：

(一)日本製造泛蒙古運動之經緯：民國八年帝俄受俄共革命之影響而告崩潰，然則仍有若干帝俄餘孽在西伯利亞擁兵稱雄而與風作浪，其中謝米諾夫者，原僅帝俄時代之低級軍官，其本人極具野心，故甘受日本指使，遂在布里雅特蒙古族人聚居區內，以帝俄之殘兵游勇裹脅布里雅特蒙胞從事劫掠行動，接受日本援助，配合其侵略北亞之野心，發動所謂「泛蒙古運動」，意圖將我內、外蒙古、漠西蒙古、布里雅特蒙古等蒙古族人聚居區，聯成一氣，外披民族自決之外衣，實際乃誘惑各部蒙古脫離我國，成立所謂「泛蒙古國」，此乃日本多年之夢想，故日本不但在幕後支持操縱，更派日籍軍人黑木參加實際行動，而謝米諾夫之妻則在東京居住，故「泛蒙古運動」之本質絕非民族自決運動，實係一白俄野心家與一帝國主義者聯合演出的一幕分化我國之醜劇而已。

「泛蒙古運動」實為帝國主義分化我蒙古之一次最有名亦最大之陰謀，所幸當時外蒙古自治官府洞燭日本之用心，並深知我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之真意，而不願隨聲附和，遂使此一分化運動聲勢大減，其後更由於美國維持所謂「均勢」思想而派兵介入西伯利亞，及蘇聯武力之進入，此一「泛蒙古運動」仍歸

消滅；然則却由於這一假藉民族自決之運動，啓發後日東西方帝國主義者或非帝國主義者，分化我蒙胞，使蒙胞脫離我國之新方向。

(二)假學術之名以進行分化之陰謀：帝國主義者除以上之侵奪，製造傀儡等手段，在我蒙古地區製造事端外，近時更有一種披着學術研究之外衣，儼然以學者專家之姿態出現，但暗中則進行分化之陰謀，這一手段既難發覺，至難防範，其結果乃在於製造歪曲理論，欺騙蒙胞，捏造事實，誣譏我中央政府，企圖煽惑我蒙胞離心離德，俾遂其鼓動蒙胞脫離我國、創我我國之目的，故此種假學術之名以分化我蒙古之陰謀，帝國主義者故優為之，非帝國主義者亦樂而為之。例如九一八事變前後日帝指使其侵略我東北，有大本營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從事對「滿蒙」之研究，曾出版無計其數之有關滿蒙書籍，假學術之名高唱蒙古人與日本人同種，而非中國人，此與美國哈佛安人費正清（Fairbank）妄稱台灣人非中國人同屬無知無恥之謬論，其邪說謬論之理論依據極貧乏，但其實地調查資料則極充實，如日本出版之「蒙古地誌」一書，洋洋三巨冊，都數十萬言，對我蒙古地區之自然地理、地下資源、風土民俗等記載均極其詳細，堪稱無微不至，我國歷來有關蒙古方面最有名之著述如蒙古游牧記（張穆）、最新蒙古鑑（卓宏謀）、蒙古記（姚明輝）等書，若與「蒙古地誌」相較，均黯然失色，因此往往使讀類似「蒙古地誌」者，惑於資料之翔實豐富，而忽略其理論之歪曲與出版者之邪惡用心，遂墮入帝國主義者陰謀分化之圈套而不自知，又如俄人波塔琴氏著有「蒙古西北概況」一書，在該書中居然一派胡言妄稱：「古時曾有一神聖喇嘛拘土於手……折草於手，吹之以氣，散之而生俄國民族，復取石四塊，吹之以氣，散之而生蒙古之四盟民族……」，類此荒誕言論，看似討好蒙古族人，諛稱彼此同為神聖喇嘛所造者，其用意實為俄國侵奪我外蒙古時減少阻力，其用心何其狠毒。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還，各國對我蒙古、新疆、西藏之研究，突然加強，著者雖不能斷定此等國家即為陰險分化我蒙古意圖之帝國主義者，但有一點必為吾人所不能否認者，即凡懷有分化我蒙古陰謀之帝國主義者，必先從研究我蒙古着手，這一股暗流，從較先之一兩個國家，進展到現在之許多國家，較先之一兩個國家，均與我為鄰國，因此吾人可以直覺感到彼對我蒙古懷有領土野心，而現在許多國家則認為「均勢」為一重要課題，故不必直接對我蒙古懷有領土野心，但彼等絕不願意見到我國之統一與團結，因此必假學術之名，藉「研究」為手段，而儘量擴大蒙古與內地之差異，處處製造蒙漢之摩擦，如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其所著「中國的邊疆」一書中，再三提到長城為中國之國界線，全然無視於中華民族之領土，其後拉鐵摩爾雖以共產黨罪名為美國政府所通緝而匿居英國，但其同路人仍在到處活動招搖；類此種無形之分化陰謀，較之有形之侵奪更為可怕，亦更不易為國人所發覺，因此我人閱讀外人著作時應特別注意，始不致上當而不自知。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簡介

莫迪

前記

國立政治大學是目前國內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的重鎮，民國四十三年在台復校以來，她秉持一向獨特的傳統，經過歷年擴充的結果，已有三個學院，二十二個學系及十八個研究所。從木柵指南宮俯瞰整個政大校園，除了近腳處游泳池旁僅為二、三棟似曾相識的舊平房宿舍外，已經換上了最時髦的新裝。早年的新建築，如新聞館、天放樓、鼎丞樓，以至於文、法、商學館等，儘管風韻猶存，總比不過新女生宿舍、新員生餐廳、新社會資料中心、研究部大樓及中正圖書館的爭奇鬥艷。

本年五月二十日政大創校五十周年，記者應邀回校參加慶祝大會，參觀由嚴總統主持的中正圖書館暨首任校長蔣公銅像揭幕典禮，聽到現任教育部長前任校長李元簇先生列舉的政大特色，促成我在會後拜訪現任政大邊政研究所所長劉義棠學長的決定。畢竟我是政大最具特色的學系——民族社會學系，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所——邊政研究所（李部長語）。雙重身份的老學生，而劉教授是政大復校邊政系第二期的老學長，也是一位腳踏實地、研究維吾爾歷史及語文，十年有成的邊疆問題專家，他是屯墾「邊疆」成功的典範。想當年，二、三子扛着理想，懷着抱負，不屑現實，不畏艱鉅，前仆後繼響應當邊疆屯墾員的雄心壯志，如今有幾個還在崗位上的（還有一位成功的例子，就是現任政大民族社會學系系主任的林恩顯博士）？踏上醉夢溪的拱橋，一瞥朦朧的指南山色，不盡又勾起一陣無謂的迷惘，還是那個老問號——對與錯的抉擇，得與失的評價——。奇怪的是：當記者訪問了劉所長，聽完了劉所長的一席話，由醉夢溪那頭再跨上拱橋的時候，看到托着落日餘暉的晚霞，像失落什麼又拾回什麼似的，似乎把蒼鶻的指南迷霧，又全然給置諸腦後了。下面就是記者當天採訪劉所長，訪問邊政研究所師生，及根據個人的親身感受，來介紹政大這所全國獨一無二的邊政研究所，特別要感謝留在所裏服務的蕭學長，他幫我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一、設立經過

政府鑑於我國邊疆幅員的遼闊，邊族情況的複雜，及邊疆建設的重要，早在民國十七年，便於中央黨務學校（即政治大學前身），設有蒙藏補習班；二十六年又擴大為蒙藏學校，培植邊政人才，從事邊疆建設。民國四十三年，政大在台復校，翌年大學部成立，首先設置的五學系中，邊政學系即為當時最具特色的學系之一。曾吸收了不少以第一或第二志願錄取的青年，在胡前主任耐安先生的主持下，先後培植了近二百名的「老邊」畢業生，其中臥虎藏龍，人才倍出，可惜當時社會對邊政專才胃納有限（但仍比後來還好，當時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寄嶠先生曾力排眾議，建立人員出缺優先由邊政系畢業、邊疆行政人員高考及格優秀青年進用的良好制度，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成立以後高喊考用合一，却再無一名邊疆行政人員被適當任用，甚且連實施十餘年，為邊政專才唯一進身之階的邊疆行政人員高考，亦停辦多年，似勝一簣），除少數能以所學，在邊政機關，或邊疆學術單位服務外，百分之九十以上，或出國，或就地改行謀生（改行的比率，高居各系畢業生之上）。最後終於走上更改系稱的道路。

民國五十六年起，邊政學系改名民族社會學系的問題，在政大甚至教育部間廣泛討論著，因為早年邊政系的設置，係經由蒙藏委員會的正式要求，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大遂將邊政系改稱及擬在政治研究所增設邊政研究組的問題，報請教育部徵詢蒙藏委員會意見。經該會復函表示，反攻復國在即，需才仍殷，請於邊政系改稱之後，仍在政大增設邊政研究所，繼續培植高級邊政專才。民國五十八年，邊政研究所成立。第一任所長，由國內外頗負盛名的蒙古學者札希斯欽先生出任，籌創擘畫，應居首功。六十年一月，札希斯欽先生應邀赴美講學，由該所兼任教授周昆田先生兼代所長職務。六十三年，周昆田先生堅辭兼職，所長職務遂由校長李元簇先生親自兼代，可見學校重視該所的程度；在李校長兼代所長的任內，邊政研究所曾與蒙藏委員會，舉行二次學術合作會議，廣泛討論加強邊疆資料蒐集運用、邊疆學校專題研究及輔導邊政所畢業生就業等問題，均獲有具體之結論。六十四年，李校長因校務繁忙，無暇兼顧所務，所長由該校民族社會學系教授劉義棠先生接任，直到現在。

二、教學目標

邊政研究所成立的宗旨，原在奉行國家重視邊疆的政策，加深邊疆學術研究，培植高級邊政專門人才，適應政府光復大陸重建邊疆的需要。因此，在教

育目標上，力求理論與實際兼顧，歷史與現況配合；訓練研究生熟諳邊疆語文（目前開有蒙古、西藏、維吾爾、滿洲四種語文，列為二學年必修課程），探討邊疆地區（分爲蒙古、西藏、新疆、東北、西南五地區）各民族歷史、地理、文化、社會、宗教、政制、經濟、教育實際情況，瞭解我國邊疆在內政、國防、外交及國際關係方面的特殊地位，檢討歷代中央政府邊疆政策的得失，參酌世界各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利弊，針對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統治下的邊疆地區現況，培養能深入理論研究，執行邊疆行政業務，或參與制定政策的能力。

三、現行課程

科目 次序	科目 名稱	修別	學分	備 註
1	中央政府邊疆政策之研究	必修	4	
2	蒙古語文	"	8-10	任選一種以上。
3	西藏語文	"	8-10	
4	維吾爾語文	"	8-10	
5	滿洲語文	"	8-10	
6	蒙古史研究	"	4	任選一種以上，但未修讀中國邊政通論，中國邊疆民族史，中國民族志者，應補修其中任何一科，不計學分。
7	西藏史研究	"	4	
8	新疆地區歷史研究	"	4	
9	東北史研究	"	4	
10	西南地區民族史研究	"	4	任選一種以上。
11	蒙古文化	"	2	
12	西藏文化	"	2	

32	西南各族政制研究	"	2	任選一種。
31	維吾爾政制研究	"	2	
30	西藏政制研究	"	2	任選一種。
29	蒙古政制研究	"	2	
28	伊斯蘭教研究	"	4	任選一種。
27	佛教研究	"	4	
26	中國邊疆宗教研究	"	4	任選一種。
25	西南各族社會研究	"	2	
24	維吾爾社會研究	"	2	
23	西藏社會研究	"	2	
22	蒙古社會研究	選修	2	任選一種，不計學分，在大學部已修六學分以上者可免修。
21	土耳其文	"	6	
20	阿拉伯文	"	6	
19	法文	"	6	
18	德文	"	6	任選一種以上。
17	俄文	"	6	
16	日文	"	6	
15	西南各族文化	"	2	
14	滿洲文化	"	2	必修
13	突厥維吾爾文化	"	2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中國與中南半島諸國關係史研究	中國（邊疆）與英國印度關係史研究	中國（邊疆）與蘇俄關係史研究	中國（邊疆）與韓國關係史研究	中國（邊疆）與日本關係史研究	西南地區專題研究	東北地區專題研究	新疆地區專題研究	西藏專題研究	蒙古專題研究	各國少數民族政策之研究	中共少數民族政策之研究	中國邊疆現況之研究	中國邊疆教育研究	中國邊疆經濟研究	西南地區地理研究	東北地區地理研究	新疆地理研究	西藏地理研究	蒙古地理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選修
2	2	2	2	2	2	2	2	2	2	2-4	2	2	2	2	2	2	2	2	2
任選一種。																			

四、師資陣容

邊政研究所師資陣容相當堅強，目前除所長劉義棠先生（主要講授課程：維吾爾語文、突厥維吾爾文化）外，專任教授有：蔣君章先生（蒙古、西藏、新疆、東北地區地理研究）、哈勒楚倫先生（蒙古語文）、林恩顯先生（新疆地區歷史研究）。兼任教授有：周昆田先生（中央政府邊疆政策之研究）、李學智先生（滿洲語文、東北史研究、滿洲文化）、胡耐安先生（中國邊疆宗教研究）、文崇一先生（研究方法論）、阿不都拉先生（維吾爾語文）、歐陽無畏先生（西藏語文、西藏文化、西藏史研究）、李毓澍先生（中國與蘇俄關係史研究、蒙古政制研究）、葛敦華先生（中國邊疆與國防之研究）。專任副教授有：唐屹先生（蒙古史研究、蒙古文化）、丘其謙先生（人類學導論）。兼任教授有趙洪慈先生（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專任講師有蕭金松先生（所務）。兼任講師有包克先生（蒙古語文）。合計十七位，均為學有專長之學者專家。

五、圖書設備

邊政研究所圖書，除部分留置辦公室供學生隨時借閱外，大部分均集中社會資料中心存放，其中較專門性圖書二千餘冊，係開架式陳列於專閣之「邊政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人類學導論	研究方法論	語言學研究	中國邊疆與國防之研究	台灣土著民族研究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	外文中國邊疆研究名著選讀	中國邊疆語文名著選讀	中亞史研究
必修	"	"	"	"	"	"	"	選修
2	2	2	2	2	2	2	2	2
不計學分，未修讀者應在大學部補修	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研究法任選。							

資料室」，其餘次要參考書近萬冊，則開架式陳列於普通文史資料室，學生運用參考極為方便。另有包括甚多珍貴絕版書刊之微捲五十餘卷，連同閱讀機等，亦一併移送社會資料中心微捲室保管運用。至於供邊疆語文教學使用之教材、教具、大小錄音機、錄音帶、複印機等，一應齊備，並得隨時利用該校語言中心設備，實施電化教學。

六、教學及研究成果

邊政研究所成立八年來，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下，無論教學或研究工作，均有相當的成就。目前在校各年級研究生共二十一名（包括二名日本留華學生），分別以蒙、藏、維、滿等語文及相關史、地、文化為主修，研究風氣甚盛。先後已有十八名畢業生完成論文，通過碩士學位考試，本年尚有二名應屆畢業研究生，還在接受學位考試中。

此外，該所為加強研究效果，提高研究水準，還定期出版「邊政研究所年報」學術性刊物一種，已出版到第八期，刊出國內外學者有關中國邊疆學術論文著作，達七十餘篇，深受各方重視。

七、學術合作

邊政研究所與蒙藏委員會關係非常密切，除曾先後舉辦二次學術合作會議，廣泛討論學術合作事宜，已見前述外；該所並接受蒙藏委員會委託，每年甄選四名研究生，就重要蒙藏問題，進行專題研究，提出研究成果，由蒙藏委員會酌予補助，實施三年，效果尚佳。

八、畢業生就業情況

本所歷屆畢業生十八名（男生十六名，女生二名），除一人赴美進修外，其餘就業甚感困難，目前雖已全部就業（大專任教者四人，中學任教者二人，學術機關二人，外交部二人，司法行政部一人，省政府一人，執政黨大陸工作會一人，金融機構一人，公民營企業各一人，其他一人），但其性質多半不能學以致用，而力促成立該所之有關邊政機關，迄今亦未能任用該所畢業生，包括高等考試及格者在內。

九、未來發展

談到政大邊政研究所的未來發展，劉所長面帶隱憂地告訴記者說：目前該

俄帝赤化下的外蒙古

赤色外蒙開始誕生

公元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大革命，其國內戰爭在西伯利亞和俄國的遠東

所面臨最大的困擾，一是研究生的出路問題，二是師資的培養問題。前者，如果邊政所辛苦培養出來的畢業學生，不能學以致用，顯已失去政府設所培植邊政專才的意義，對國家、個人，都是嚴重的浪費和損失。後者是個特殊的問題，依規定祇有副教授以上，才能在研究所開課，該所的碩士畢業生，要取得講師的資格和升副教授的年資，唯一的途徑先得在大學開課，而目前國內各大學除了政大民族社會學系還保留若干點綴性邊疆課程外，並無任何科系開設是項課程；在國內外尚之以邊政研究修讀博士學位的形勢未改觀之前，若不及早設法解決，或許該所又將重蹈邊政學系的覆轍，走向停辦或改稱的命運。談到這裏，劉所長提出一個構想，希望會同有關機關，發起國人重視邊疆、認識邊疆運動，一方面促成與培養國人重視邊疆、認識邊疆有直接關係的國內各大學史、地學系及各師範專科學校，設置邊疆民族史及邊疆地理等課程；一方面以政大邊政研究所為基礎，成立邊政研究中心，設置專、兼任研究人員，集合同黨政機關及學術機構的人力、物力、財力，長期研究過去、當前及敵後各邊疆地區有關問題，並為邊政研究所儲備、提供合格師資，可以在光復大陸期中，隨時保持短期內大量訓練派赴邊疆各類工作人員，和迅速研擬各項正確可行邊疆方案的能力。

記者非常佩服劉所長的高瞻遠矚，歸途中曾就其提示的規模，略為盤算：像這樣的「邊政研究中心」，預算實屬有限（大概年需經費約二、三百萬元，從目前各相關機關因此中心之成立可能節省的研究經費移列，還有幾倍的剩餘），效益既大且廣，不僅着眼於將來（除培養的有限專業人員外，其餘將來需要派赴邊疆的其他人員，屆時均可由此中心負責施以短期訓練，使其適應邊疆工作），而且兼顧到目前（成立此項研究中心以後，可以針對目前所需的邊政專才，作重點培植，隨時視實際需要量，調節邊政研究所的招生名額，經由質量的控制，避免人才的浪費），樂於利用本刊版面，代為呼籲如上。國家不幸播遷海隅，吾人既不以偏安為滿足，時時為反攻籌計，如何圖十分國土佔其六的邊疆地區之長治久安，謀五族共和居其四的邊疆同胞之幸福樂利，誠為當務之急，從政大邊政學系、邊政研究所的先後設置，及對各邊政機構的始終維持，足見政府重視邊疆之政策絲毫未變，苟有確能興利除弊之議，必不以區區增加之經費為吝惜，甚盼黨政有關機關考慮是幸。

彼德羅夫 著
Victor P. Petrov
林佩音 譯

地區進行達五年之久，當此時期，蒙古竟成了赤俄與白俄爭奪戰中的犧牲品。一九一八年三月，中國針對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普遍崩潰與動盪不安情況，進軍佔領庫倫（後更名為「烏蘭巴托」），此一行動雖有達一九一五年的條約協定

，但是俄國人也沒有立場來提出抗議或援助蒙古加以抵抗。一九一九年十月，北京政府的徐樹錚將軍宣佈已完全控制了蒙古。

第二年俄國人相互鬥爭情況益形尖銳，蒙古附近地區的白俄軍遭受到赤俄軍的嚴重壓力。一九二〇年十月，白俄軍騎兵支隊司令恩琴（Baron Ungeln Von Sternberg）率領其軍隊闖進了蒙古邊界，被中國部隊攻擊而撤退，當時其軍隊已到達庫倫，不過恩琴尚未公開宣佈其挽救亞洲與歐洲免於赤禍之確立意圖，儘管其觀念中認為歐洲並不值得挽救。後來恩琴決定組成一個新的大蒙古國並自任領袖。

恩琴在俄國被認為是一位優秀的軍官，有天生領袖才能，於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之俄國戰爭時負有盛名，一九一〇年他以俄國皇家軍官身份被派前往蒙古，督導俄國駐蒙古領事館工作，並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英勇作戰而獲頒勳獎，可是恩琴在一九二〇年及其後來幾個月中的行動，顯示其精神方面已失去平衡，也許由於其家人慘遭布爾什維克人（按即俄國共產黨份子）殺害之故。無論如何，他的消滅共產主義和恢復俄國、中國與蒙古的君主政體計劃，已是衆所皆知之事。

恩琴之消滅所有共產黨人的主張，不幸失敗。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他再度發動攻勢進軍庫倫城，中國軍隊倉惶撤退。所有左傾份子特別是猶太人均被捕槍決。總之，恩琴在蒙古人心中已是一位知名人物了。恩琴不但熱愛蒙古同時還公開宣佈保留寶吉活佛（Bodhi Gesa 譯者按即哲布尊丹巴）喇嘛教主的宗教領袖地位，所以他原有白俄軍隊八百人，由於蒙古志願兵的加入很快就擴展到一萬人。

當恩琴正計畫實施其龐大計劃之時，一件關係蒙古前途有重大影響之事件，發生於蘇俄邊境一個名叫托可沙夫斯克（Troitskoyevsk）的地方，該處有一大群蒙古人受俄國紅軍武裝保護，組織了一個新的「蒙古人民政府」，蒙古的革命領導人蘇赫巴托（Sukhe Bator）被推選為作戰部長，也是新政府屬下蒙古革命軍的總參謀長。

此事接下去發生一段插曲，一半是鬧劇，一半也是悲劇。恩琴原先計劃不但保護蒙古抵禦其北方的共產黨鄰邦，而且要進攻俄國解放蘇俄人民，於是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對托可沙夫斯克發動了一次時機尚未成熟的攻擊，蘇赫巴托新編組的軍隊力感不支，但俄國紅軍有足夠力量迫使恩琴部隊退回蒙古，在此情況之下，蘇赫巴托乃請求俄國指揮官協助其驅逐恩琴，而蘇俄紅軍却以說服方式使恩琴率領部眾越過邊境而去。此時若干服役恩琴部隊的蒙古兵開始紛紛逃亡，一部份不滿俄國人的蒙古兵受到了警告，深恐引起恩琴之責罰而逃走。紅軍部隊於七月八日進駐庫倫，兩日後新的蒙古政府宣佈成立，蘇赫巴托出任作戰部長兼總參謀長，其助手喬巴山（Chobalsan）副之。

恩琴此時仍未準備放棄其既定之目標，他極力逃避紅軍的追蹤，帶着一小

部份親信東竄西走。八月二十二日他決定一次攻擊行動，預期了安全到達其指揮下在蒙古的單位，孰料該單位早已安排妥當將其捕交紅軍。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恩琴在蘇維埃政府西伯利亞軍事法庭中以反抗蘇維埃罪名被判處死刑。

新「蒙古人民政府」第一項法案宣佈其政府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開始獨立，但由於遠東地區有爆炸性的國際情況存在，因而極力傾向俄國。中國當時雖國內軍閥彼此戰爭不休，對蒙古仍極感興趣，祇是俄國陳兵以待，故而使國人無法實現其收復此一偏星國之企圖。日本此時的政治和軍事在東方是極盛時期，它對蒙古也擺出了威脅姿態。蒙古為了保持其基礎不穩定的獨立，所以認為必須接受國人的種種支援。

新建立的「蒙古國」一開始就和蘇維埃聯邦進行合作，一項「友好互助條約」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完成簽訂手續。這個「獨立國」在早期幾年之中，共產黨首腦們能容許蒙古人保留宗教領袖寶吉活佛為國家名義上的領袖，倒是令人驚異之事，不過，宗教以外的一切權力全部屬於蘇赫巴托，後來喬巴山繼承了蘇赫巴托的權力。

寶吉活佛於公元一九二四年逝世，蒙古即宣佈共和政體，呼拉爾（Khural 註：相當於議會）被用作最高權力機構，這是模仿俄國最高蘇維埃制度的統治政權。蒙古的新憲法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誕生，首邑的名稱改為烏蘭巴托（Ulan Bator）。「蒙古人民共和國」因此無論在形式上、在事實上都成為蘇俄的衛星國了。後來在喬巴山統治下的蒙古，史達林就逐漸將「恐怖手段的運用方法」推介進來，藉以控制農業經濟及奴役人民，而蒙古的黨方負責人對此也極能模仿運用。喬巴山的許多黨內同志中，雖然參加過「新蒙古國」的建設工作，但結果却遭到了清算鬥爭，其次是地主和僧侶們也受到同樣的驅逐，這些人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因階級成份原因被清除殆盡。牛馬羊群等家畜和私有財產表面上分配給貧苦的農民，而事實上都成了政府的公產。共產政權接下去令關閉所有寺廟，喇嘛僧侶們都被迫還俗，雖然還俗之事在佛教是嚴格禁止的。這種蔑視人權沒收財產政策，不僅是以地主的喇嘛為對象，同時也遍及一般中農階級，因而導致一九三二年大批僧侶的集體反抗行動，這些數以千計的出家人在忍無可忍情形之下，隨帶着牲口越過邊境向內蒙古逃亡。根據蘇俄官方統計，此次事件使蒙古減少了七百萬頭家畜。

由於上述喇嘛集體逃亡案之發生，好幾千名的黨員以執行偏差的罪名被提起控訴，並即遭受整肅。被指控的左傾份子罪名是：曲解黨的路綫，迫害僧侶、接管寺廟進而加強掌握封建制度和抓緊喇嘛主義的高層僧侶政治；右傾份子被控理由為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及在國內建立一個封建政權。

俄國與蒙古的合作情況在此幾年中極為緊密，俄國的物資與原料大量地運進蒙古，經濟方面亦適時加以援助。第二次的俄蒙互助條約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烏蘭巴托完成了簽字手續，事後蘇俄頗以此為榮。同年五月日本的關

東軍企圖進佔東蒙古，俄國立即以部隊、飛機和坦克車援助蒙古，並將這些軍隊安排佈置在日本的「勢力區」之內，而這些區域日本原意欲將其變成滿洲國一樣的殖民地。所謂「滿洲國」在名義上是由康德（Kong-Teh——譯者按應為溥儀）統治號稱獨立，實則由日本顧問所控制。

德軍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攻蘇俄，蒙古並未主動參戰，但以食物、家畜和馬匹供應俄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前幾天，蒙古開始參戰，俄國此時使用蒙古騎兵部隊襲擊滿洲。蒙古騎兵橫跨了戈壁沙漠向敵人佔領區的中國北部進兵攻擊。

中國國民政府始終是堅持拒絕外蒙古獨立，而俄國史達林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雅爾達會議中，表示蘇俄願意參加對日戰爭，但附帶條件是容許外蒙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其「國家」成為完全獨立或成為中國的自治區。結果總數有四八七、四〇九人在俄共控制下參加公民投票，選擇了獨立一途。

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之事，多少年來都遭到否決，但不幸在共產集團與民主世界之間終於達成「整批交易」的協議。蘇俄提出在容許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之條件下，它亦反對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進入聯合國。因此，外蒙古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成為蘇俄羽翼下培養出來的聯合國會員國。

蘇赫巴托與喬巴山的統治時代

外蒙和它的北方鄰國——蘇維埃聯邦有頗多相似之處，自從一九一一年以後，它就不停地整肅和流血，但是它不缺乏領導份子，這些人並不能說都獲得成功，不過其中有三人處於顯赫狀態的時間甚久，他們有足夠的生命為外蒙服務。該三人的姓名是：蘇赫巴托（Sukhe Bator）、喬巴山（Gaidan-aan）和澤登巴（Tsedenba）。

當一九一九年時，有兩千小型蒙古革命組織各自獨立組成，一個組織由蘇赫巴托領導，另一組織是以喬巴山為首，這兩個領導人可是從未謀面。這兩位特殊人物出現的理由，因為都是知識份子。在此國家除了僧侶喇嘛之外，大部份幾乎都是文盲。他們二人在年青時接受教育並主修俄文，乃奠定了未來事業的良好基礎。

蘇赫巴托同喬巴山一樣，出生於貧苦家庭，十四歲時即開始擔任傳遞郵件的信差工作，這份工作雖然並不理想，但可以接觸到受過教育的蒙古人，使他開始接受了教育。外蒙古於此時已成為「自治區」，蘇赫巴托被徵召入伍當兵，其服役的軍隊係由一群不識字的青年所組成，故蘇赫巴托因能讀能寫很快被提升為軍官，不過，他是未經正式任命的一名軍官。

蘇赫巴托並非出身於貴族家庭，如在承平時代，他頗願獻身於此一未經正式任命的軍官職位而終其一生，但時間究竟距離承平之日尚遠。此時正當俄國內戰之時，中國乃乘此機會在西伯利亞邊境進行活動，進而將目標移向外蒙的

「首都」庫倫。外蒙軍隊迅即遭到解散，蘇赫巴托於一九一九年在好幾千人的兵員中同被解散，他仍以「老兵」自居。其他很多士兵雖是在游牧生活方式中長大，但已習慣於軍中生活，他們深感與家庭已逐漸疏遠了。在這些情況之下，二十六歲的蘇赫巴托對於號召這些士兵並加以領導起來，認為並非難事。

恩琴此時實行了大屠殺政策，不但刺激了蘇赫巴托的思想，並因而造成這位年輕領導人開始推行蒙古革命運動。他沒有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所誘惑，在意識中對蘇俄的鬥爭情形所知也有限，事實上當此運動成為政治問題時，他還是機實天真的，他是國家主義重於馬克思主義或國際主義的人。

至於喬巴山却與蘇赫巴托不同。喬巴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他接受了一些正規教育，對文字的閱讀能力甚佳，於俄國革命以前就在西伯利亞和俄國革命份子有所往來。喬巴山的十三歲至十七歲這段時間是在寺廟中度過，到十七歲時就跑到庫倫去，並且在一所學校中擔任翻譯工作，由於他肯努力學習，很快被送到東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Irkutsk）一所俄國高級中學去讀書，嗣因俄國發生革命，喬巴山被迫不得已離開伊爾庫茨克返回蒙古。一九一九年蘇赫巴托在蒙古自行組織了一個革團體，其時喬巴山祇有二十四歲，他的部眾與蘇赫巴托所領導的退伍士兵不同，這些部眾都是蒙古社會平民階級中的不滿現狀份子。

蘇俄巴托和喬巴山所率領的成員中祇有兩種人是受過教育的，一種是喇嘛，另一種是外蒙自治區時代的公務員，這些人之中大多數都很有能力和政治經驗。蘇赫巴托和喬巴山同時也吸收了一位特別能幹的領袖人物——邁克薩捷（Maksatja），這個人早於一九一一年業已成名，當時中國正發生革命，他起而反抗滿清皇帝，後來參加恩琴的軍隊是基於單純的國家主義理由，所以幫助恩琴將庫倫的中國人驅走。不久，邁克薩捷被恩琴政府任命為作戰部長，當其發現恩琴之動機並非為了蒙古獨立之後，邁克薩捷又轉而投効蘇赫巴托和喬巴山。正如蒙古的早期革命份子一樣，他終於又和這兩位成功的領袖採取對立態度，最後以「賣國賊」罪名被殺身死。

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喬巴山和蘇赫巴托之間從未見過面，直到雙方組織的領導人和代表們在蒙古邊境西伯利亞的一個城鎮名叫恰克圖（Kяхhta）的地方舉行會議的才正式會面。此時因恩琴仍在掌握蒙古大權，所以這種型態的集會一定要在俄國領土上來舉行，由此也顯然可以看出蒙古本身對於革命運動支持不力的情形了。不管如何，參加恰克圖會議的二十六位代表還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了一個新政黨，那就是迄今仍然存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所有參加恰克圖會議的代表二十六人，可以召集到約四百名戰士。當他們決定進攻蒙古以後，就以這一群人數甚少但非常忠貞的戰士為主要戰力衝過邊境，佔領了買賣城（Maimachen），並在此地成立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缺

之資源，更缺乏民衆的支持，倘使蘇俄政府不予介入及時加以援助，這些領袖和戰士們只有停止活動一途可走。這件事可以更正確一點說，是革命份子邀請紅軍進入了蒙古。不論如何，蘇俄援軍迅速移進到庫倫，結束了恩琴的統治。這一小部份所謂革命份子，就成為「獨立的蒙古政府」官員了。這是以一幕喜劇式的開始使這個新獨立的「國家」生存下來。俄國援軍或多或少有所保證，保證蒙古將受到俄國的治理。

宣佈新獨立的外蒙情況，在最初幾年當中很不穩定，聯合政府是由原始的一小群革命份子包括公務員，舊貴族和喇嘛所組成。寶吉活佛保持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的名義，而政治實權則由保多（或譯為鮑德 Bodoo）所掌管，保多過去曾做過喇嘛，現在則是內閣會議主席。為了密切配合寶吉活佛起見，蘇赫巴托使保多這一位喇嘛參加了革命組織。

到一年以後，新政府的一切措施均由保多決定，蘇赫巴托則擔任作戰部長兼陸軍總司令的職務。此一誕生不久的政府，在作為方面頗有國家主義的傾向，不適於蘇俄的理想。根據俄國預計，全世界各國政府在一九二〇年初期應有普遍的暴亂和崩潰情形發生。俄國為了不滿蒙古的國家主義傾向並進而實施整肅起見，派很多特務工作人員到蒙古，其結果很快就被揭曉，那就是保多和其他十四位行政負責人均以捏造之罪名被捕接受審判，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這一群所謂「叛逆份子」被執行槍決。這被處死的十五位領導人士以及其他二十六人，都是在一年前才來到此恰克圖的。自從此次案件發生以後直到現在為止，蒙古的一切措施皆按照蘇維埃的模式行事，不敢再有所越軌。

蘇赫巴托於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逝世，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導因於肺結核病，但官方宣佈他是被喇嘛所毒害，這種聲明顯示對喇嘛們將有所不利。蘇赫巴托之死，使他變作英雄人物，成為家喻戶曉的「救世者」。假使他再晚幾年去世，極可能被其陰謀兇狠的對手喬巴山所擊敗，成為鬥爭中的犧牲品了。一年以後即一九二四年，寶吉活佛逝世，聯合政府中所有偽裝的分歧政治集團以及各階層份子全部都放棄了假面目，形成了真正「俄國式」的國家，並於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定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自從蘇赫巴托去世以後，外蒙的整肅工作和執行死刑已列為經常的施政措施。一個有能力但野心勃勃的丹桑（Daan）竊據了副總理兼陸軍總司令的職位，其後丹桑及其隨員巴維山（Bavasan）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三屆會期中的一場風暴會議中被逮捕，兩人旋即被殺。此一事件發生後，清算目標指向了雷清諾（Rinchino），他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布里雅特，參加恰克圖會議的二十六位代表之一，布里雅特另外還有一位參加會議的代表名叫薩差諾諾（Zamtsaranov）。雷清諾的身份是蘇維埃共產黨第三國際代表，他的主要任務為監視此一蒙古新革命黨及其領導人之一切動態，他運用職權擊敗了丹桑和巴維山並獲得完全的勝利，可惜好景未能維持太久。一九二五年他被調離共

產黨第三國際代表的職位，隨即被遣返俄國，一直活到蘇俄的整風吹到他身上為止，他是於一九三七年因遭整肅被處死刑。薩差諾諾則在一九三二年被遣送到列寧格勒，於一九三七年雷清諾被殺之同時被捕，惟對其似未再加以深追，最後可能集中在集中營中死去。

丹桑與巴維山之遭受清算整肅，無疑是為喬巴山作政治前途鋪路，喬巴山於丹桑死後繼任陸軍總司令，再經過不斷攀登，終於掌握了外蒙政府的黨政大權，他的成功過程與史達林爬上蘇維埃最高階層的方式相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喬巴山高升的結果之一是一九二八年的整肅風暴震撼了整個外蒙古，當時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席丹拔道兒濟（Danba Dorji）以右傾罪名遭到鬥爭，其後被流放到莫斯科，一九三二年他就死於莫斯科。其他為數甚多的黨員皆以「右傾偏差」罪名被革職清算。

以後十年之中，主要工作就是實行清除異己和大屠殺政策，被判執行槍決的犯人名單中，根據蒙古官方報紙公開發佈，包括有國務總理、大喇嘛、卡車司機和一般牧人。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之間，有八百戶家庭被沒收充公，兩百位屬於宗教組織的權力官員經過鬥爭以後，不是被槍斃就是被監禁起來。第二次的大整肅發生於一九三二年，其主要因素是過度而太快的實行「左傾偏差」而引起，進而為外蒙全體人民造成災害，其結果使外蒙最寶貴的財產——家畜牲口受到非常驚人的損害。

喬巴山當權以後，鬥爭對象有寺廟僧侶、殘餘的貴族份子、店主、小康農民和不斷加深仇恨的喬巴山政敵等。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兩年之中，有兩千名喇嘛僧侶以把持寺廟職權的罪名被殺。到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僧侶喇嘛和上流社會階層悉被清除，其中有一部份人逃往內蒙古投奔親友生活。

整肅風暴到達了外蒙社會的每一階層，屠殺目標接着指向政府部門、共產主義國際、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最神聖不可侵犯的黨書記。在一九三二年，蒙古人民革命黨自稱有四萬二千黨員，兩年後祇剩下了八千人。至於共產青年組織也未能倖免，該組織所有領導份子幾乎都分別被整肅、槍決或監禁起來。其後於一九三五年重建組織時，登記的會員祇超過六千人，與其從前的二萬三千人作一比較，顯然很多都已經潰散掉了。軍隊方面殺人魔王的血手也並未考慮放過，所以在俄國史達林判處托卡契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帥死刑的同時，喬巴山的安全部隊也對蒙古陸軍總司令戴米德（Marshal Demid）將軍進行指控，結果戴米德雖未遭槍決，但於一九三七年遣送赴莫斯科途中在火車上被毒斃。

在此時期，喬巴山似與史達林比賽爭勝，繼續其毫無阻礙的扶搖直上命運。一九三七年喬巴山擔任內政部長並負責安全部隊指揮工作之時，很成功地清算了國務總理金敦（Gandun），兩年後金敦繼任人頗受眾望的安摩爾（Amor）及其高級官員數人亦均被殺，喬巴山本人則驕無忌憚的爬上了國務總理寶座

。一九四〇年末期喬巴山的政治地位已到達了最高峯，他的競爭對手一一被清除完畢，他是早期恰克圖二十六個代表中唯一生存於世的人。

接下去十年，亦即一九四一到一九五〇年，是蘇俄史大林的最驕傲時期，而蒙古竟掀起了「個人崇拜」風潮，主要原因是喬巴山對史大林過度諂媚的結果。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八日喬巴山以癌症死於莫斯科醫院，他比史達林早死了一年多時間。喬巴山之死，為外蒙政治生命開創了另一個新紀元，新政府在控制方面較原來政權稍事放寬，也減少對恐懼思想的灌輸工作，不過，國家仍然是由一個人的意志所統治，但新領袖並非軍界人物，而是主張專家政治的澤登巴。

在一九二一年蘇赫巴托的部隊開始攻擊外蒙古之時，澤登巴祇有五歲。當澤登巴長大到一九三〇年代的時候，布里雅特人早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強盛時期終止對蒙古政治力量的發展，而為數佔蒙古全民百分之九十的喀爾喀人此時業已掌握政權。布里雅特人從政治舞台上被排擠下來，轉而由年青的喀爾喀人澤登巴開始當政。一九四〇年的澤登巴年齡才二十四歲，他在喬巴山教導之下擔任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當時很少人注意這件事，但一顆新星此時已在政治地平線上出現了。

就實際情形而言，以澤登巴這樣年青政治家來接管政權總比一個保守的革命份子接管要顯得有意義。這是一次外蒙政府權力結構改變中的分界線，一九二一年入黨的老黨員們所組成的新社會，到此不得不將權力移交給下一代，這下一代的青年很多是在革命之後才出生，有的於一九二〇年代動亂時期尚在兒童階段。

「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最初期間，內部鬥爭情況異常激烈，因而有許多人喪失了職位，予年青一輩讓出了空缺，共產黨青年組織就是接收了這種經過訓練的成品。新的一代多不是軍人出身，不能以軍事上的成就或參加過革命鬥爭自誇自豪，有些雖於二次世界大戰時獲有軍階，但缺乏勇敢表現亦不曾有過優越的軍事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結束前幾天，蒙古才聯合蘇俄參戰，所謂參戰，祇是參加了一次對中國境內日本軍的閃電戰而已。蒙古的軍階是政治意義重於軍事方面的成就，舉例而言，澤登巴曾經是三軍中將總司令，而其真正的職位是政治工作監督人，其第二項頭銜是灌輸政治思想的指揮官。

外蒙政府這些新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是一般平民，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良好訓練，並且都是專門人才，與早期的革命領導人完全不同，早期人物中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澤登巴對經濟問題有特殊研究，他在烏蘭巴特的財經學校擔任導師職務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正如他這一代其他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澤登巴也是主張專家政治的。

對外蒙政府的政權接管，說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澤登巴於喬巴山死後繼任了國務總理，兩派之間曾迅即展開暗中鬥爭工作，結果澤登巴暫時獲勝扼

政，其原有之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則交由丹巴（Damba）接替。此二人在表面合作情形下統治外蒙四年，到一九五八年澤登巴集中足夠具有影響力的支持者以丹巴親中（國）為藉口將其免職。然後澤登巴又恢復擔任中央委員會書記名義，成為黨政雙方的領導人，也是十足到地的外蒙政府統治者。

要保持上述黨政兩種職務的穩定也頗不容易，因為自由主義的趨勢，除了中共和阿爾巴尼亞外，所有共產國家都瀰漫着這種氣氛，澤登巴必須運用各種方法以維護其權位及繼續控制全局。首先他將一批佔據黨政要職的喬巴山派幹部加以調動，此事經過一九六二及一九六三年的不斷整肅之後完成。新的政策定名為「否定喬巴山集團」，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指控喬巴山以前的幹部心腹所提倡的「個人崇拜」。澤登巴運用此種方法調動了若干他認為最危險或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對手，這些人物中有公共安全部長和蒙古最可怕的秘密警察負責人。還有陸軍政治部主任、陸軍參謀長以及烏蘭巴特的警備司令也全被調職了。澤登巴控制了安全部門與陸軍部隊以後，接着又向中央政治局的第二號頭目也是黨中央的第二書記策恩德（J. Tsedenbaev）進行挑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策恩德終於遭受整肅的命運。從那時候開始直到現在為止，澤登巴顯然已完全掌握了外蒙政府以及其軍事、政治部門。澤登巴為了其個人榮譽問題，表示並未完全實施整肅工作，他似乎已從赫魯雪夫處得到暗示，即舊革命份子如蘇俄之莫洛托夫等，都應該予以流放。

知識程度不發達而物資文明又落後的蒙古，在向前進步的道路上是血跡斑斑的，成千上萬的生命因此而犧牲掉了，不過，在這些生命犧牲性中的一大諷刺是若干人並非毀於新制度下的政敵，而是死於那些與自己併肩協力創造新國家的人之手。根據跡象顯示，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的浴血鬥爭不致重新再演。蒙古仍然是極權的社會，但就目前情況而言，似乎已在進行轉變之中。

外蒙共產黨說的話就是法律

自從十七世紀末葉中國的滿清王朝統治蒙古以後，其行政區分已幾經改變。曾有一度時期，現在之「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境被分成四個大愛馬克（Aymags，註：相當於部或省），另外再加上衛拉特（Oirat，註：西方部落之一）控制下的科布多（Kobdo）地區在內（按：衛拉特在政治立場方面與外蒙古是聯合一致的），這五個行政區域構成龐大而無法運用的現象，嗣後又被細分為一百一十個公國（譯者按即旗），都是世襲制度，一直維持到公元一九一一年為止。

外蒙古的現行統治集團，依據地理疆域、經濟狀況、種族區別、居民分佈以及行政管理等情形已將外蒙古分成十八個愛馬克（Aymags）。愛馬克的面積各個不同，從一六、六〇〇平方英里到六三、七〇〇平方英里不等。每一愛

馬克又分為十二到二十六個蘇木 (Somon, 註：部或省下屬之行政組織)，相當於美國的行政組織狀況。又每一邊馬克至少有一個旗 (Kholon)。以烏蘭巴特而言，它是被劃成十一個旗，這所外蒙唯一的大都市，其居民約在二十萬人以上，它在行政組織方面是獨立的，不屬於十八個邊馬克的範圍，與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ashington D. C.) 情形極為相似。

蘇俄前總理赫魯雪夫某一次曾公開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之時」，全世界祇有兩個國家是共產制度的政府，那就是蘇維埃聯邦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說實在的，蒙古共產黨統治下的演變情形的確和蘇俄完全一樣，如強迫實施農業集體化，沒收私人財產以及恐怖的清算鬥爭等等，其結果的影響是現在蒙古政府的組成成份也和蘇俄如出一轍。呼拉爾 (Khural, 即最高議會) 選舉主席團於呼拉爾大會閉幕後掌理國事，外蒙古的憲法與蘇俄相同，立法、司法及行政等所屬機構僅名稱上與蘇俄稍有不同而已。

現行外蒙政府是依據一九六〇年的「憲法」所產生，每隔三年選舉一次，它是國家最高的行政實體。雖然黨務機構對候選人的組織早已選擇妥當，而每一台法民衆仍被要求參加選舉。以一九六〇年的選舉情況為例，百分之九九、九八的選民投票予官方候選人，二百六十七人獲選參加呼拉爾，其中約百分之四十強為白領階級，百分之三十三為農業集體機構為代表，百分之二十五為工業或其他種類的工人。

呼拉爾的會員們每年舉行一次簡要會議，地點是在首都所在地。倘在呼拉爾會議完畢後因緊急事件發生，經主席團或三分之二會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議。主席團是呼拉爾會議後統治全國的權力組織，它是由呼拉爾中的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會員六人所組成。

政府的最高行政實體是閣員會議，閣員人選由一年一度的呼拉爾會議通過產生，司法權屬最高法院，愛馬克法院 (相當於美國地方法院)，市法院及特別法院從事協助支援。最高法院法官是由呼拉爾所派任，任期每屆三年，首席檢查官的角色相當於美國的檢察長地位。這些官員或機構均無統治外蒙的真正實權，在所有官方文告、法令、職權之幕後，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是全國唯一的政黨却掌握了一切實權。

滿清王朝統治蒙古時期，謀反事件除了偶然孤立的和難獲成功的試圖之外，從事政治活動是無法存在的。直到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接管外蒙為止，在此以前沒有一個蒙古政黨得到過生存的機會。一九二一年三月蘇赫巴托與喬巴山在俄國邊界的恰克圖地方舉行會議之後，「蒙古人民革命黨」方始誕生。該黨在蘇俄軍事援助之下於外蒙新獨立國之首都正式成立就職，列寧則催促蘇維埃政府儘速承認外蒙政府並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外蒙古與蘇俄簽訂了第一份國際條約。

將這種近乎封建的制度改變為共產主義型態的政府是逐漸行進的。經過戰

爭破壞的蒙古不僅曾遭受中國的治理，並且更受到那小型但頗具機動效率的白俄騎兵部隊統治之苦，該部隊即係由恩琴所率領，曾將中國人趕出外蒙，其本身嗣後又被俄國敵人擊敗。有一件頗為可疑之事，即蘇赫巴托及其僚屬們對於掌握權力的措施方面，顯得並不十分週密。大家都知道喇嘛教在蒙古民間甚具力量，該教是蒙古西藏地方的一種佛教，蘇赫巴托使該教最高領袖也是政治領袖的實吉活佛保持其原有地位，但限制其僅能行使宗教事務權力，一般行政權則由總理保多 (Bodo) 與蘇赫巴托負責，蘇赫巴托擔任作戰部長及陸軍總司令雙重職務直到一九二三年逝世為止。這種共產主義與宗教的不正常結合是由於非常複雜的國際情勢所造成，中國與日本對蘇俄援助外蒙並促使其轉移改變之狀況，均密切注視其發展。

外蒙古內部的不安情形於一九二四年告一段落，實吉活佛此時已去世，於是共產黨統治者們決定完全接收政權。王子和地主們開始被清算，他們的財產與牛羊被政府沒收充公，其作風與從前的蘇俄情形一樣。共產黨對於這件事執行得很小心謹慎，當其積極清除舊貴族的一切遺風之時，絕不去得罪宗教領袖人士。共產黨統治三年以後，喇嘛教在外蒙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量。蘇俄巴托死後，領導權落入野心勃勃的喬巴山之手，喬巴山一切所作所為與蘇俄史達林極為相似。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後曾經受到公開批判，理由是他將「個人崇拜」之風引進了蒙古。蒙古作者協會於一九六二年舉行會議時，曾發表一段具有代表性的秘密言論，現將其擇要如下：「喬巴山時代利用文學歪曲歷史及歷史中黨的地位，並利用其作為增強個人崇拜的武器，因而招致嚴重的不良後果。當時文學如果要想存在，祇有對喬巴山不斷予以歌頌，並將其對國家之貢獻及領導進步等加以誇張和渲染」。

史達林領導之下的蘇維埃聯邦共產黨與蒙古人民革命黨幾乎完全相同之處就是精於國內鬥爭工作，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大分裂發生於一九二八年，當時「右傾偏差」份子與以前蘇俄史達林的政敵遭遇到同樣不幸的命運；「左傾偏差」份子則於一九三二年受到清算。黨把所有發生的錯誤歸咎於左派之內容如次：沒有深入考量蒙古的傳統生活方式，人口集中未成仍處於游牧狀態，國家經濟生命受到擾亂。以上這些情形，蘇俄在本身整肅之中進行自我檢討，並對所有指控的罪名發生共鳴。

外蒙古的總人口之中，有百分之五是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或預備黨員。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蒙古人民革命黨召開第十五次大會時的預備黨員總數是四八、五七〇人。這些人數之中有百分之五十是白領階級，百分之二十強是農業工作人員，百分之三十是工業或其他方面職業人員。所有黨員和預備黨員之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婦女。一九六六年的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是由黨員七十五人預備黨員五十一人所組成，當時中央政治局是由七個人組成，其領導人為澤登巴，他同時也是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和喬巴山的繼承人。至於蒙古人

民革命黨黨員及預備黨員在人口總數的比率，則與蘇維埃聯邦大致相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府結構與其他共產衛星國家完全相同，國家所有高級官員都屬於蒙古人民革命黨黨籍。黨所說的話就是法律，黨是國家的實際統治者。

在落後的經濟中掙扎

五十年以前，外蒙古倉卒的脫離了中國的治理，其工業和農業方面簡直是毫無基礎，祇有家畜的牧放工作是代表這一「國家」僅有的重大經濟活動。共產黨以前時代的庫倫——外蒙沉睡中的小小首都，有極少數的工業和貿易存在，而這些工業和貿易絕大多數還是屬於外國人的。關於進出口貿易方面，出口有獸皮、獸毛和原料；進口有加工產品，主要是紡織品和家庭用品。實際上外蒙對外的每一家交易都是由外國商人經手處理，這些外商之中絕大多數是俄國人，也有少數交易是經過美國、英國和德國商人之手處理。國內貿易一般都是由中國小商店所經營。庫倫僅有居民數千人，其他鄉鎮則更小。都市中的居民很少願意到典型的小鄉鎮去定居。外界人士對蒙古的印象是二大草原上散佈一群群的游牧部落，在西北地區是連綿的山脈和南部地區的戈壁大沙漠。一點也不錯，事實上確是如此。

外蒙的經濟成長，以往曾具有若干基本阻礙的因素。佃農與地主之間保持着半封建的關係，人數衆多的喇嘛們生活在沒有生產能力的喇嘛寺廟中，但是他們却擁有蒙古家畜的很大百分比，他們是這個地區經濟生命的阻礙物。畜牧業產品幾乎佔了外蒙經濟的百分之九十，這些尚未加工製造的產品，主要是向中國內地和蘇俄外銷，英美兩國的銷售量減少。外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依賴獸類載運，牠們悠閑地沿看成吉思汗時代用脚步行成的道路來往行走，現代交通工具如馬車等則偶爾可以見到。外蒙古一般地區並無正式道路，祇有與已經開發地點有關聯的地區才建築真正的公路，這些地區如庫倫、烏里雅蘇台（Uli-Yassutai）、科布多和俄國邊境的恰克圖（Khabarovsk）以及張家口。

現在情形已經有所改變，外蒙的經濟正在發展之中，不但開設了一些工廠，還開發了煤礦、鐵路、公路和電力設備，同時加強畜牧生產事業，並對農業方面作若干程度的開展。不過，五十年來的工業成長情形要比農業方面快得多。在一九三〇年代期間，外蒙曾決定試行改變其國有經濟狀況，所以部份新的工廠在蘇俄協助之下建設完成，鐵路構築則始創於一九四〇年初期，一九四八年着手進行一連串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目標雖然是發展全面經濟與儘量利用天然資源，而主要努力方向則是在改進畜牧事業。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以加強改變經濟景象並導致工業發展方面迅速獲效益為主，同時也增加農業生產。由於很多地區大多數居民習慣於從事牛馬等

家畜的飼養工作，所以農業仍然是次要的經濟活動。在推行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之下，大部份地區被劃為農耕地。接着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又實行了一個三年經濟計劃，集中一切力量來發展各方面的經濟。

在以上這幾個經濟計劃發展階段中，資金總額的比率與價值迅速增加，從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期間為數兩億零三百七十萬土格里克（Tugriks，蒙幣單位）則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期間的六億土格里克，最後於一九五八則一億六〇年實施其一個三年經濟計劃時已經到達九億六千一百萬土格里克，這些數字尚不包括外國的援助在內。如果將蘇俄、捷克和其他共產集團國家投資數目列入計算，則三年經濟計劃中的資金總額已到達一十三億土格里克，數目頗為驚人。

第三個五年經濟計劃（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資金總額是四十四億六千萬土格里克，在此總額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用於發展工業。其中有三種工業的佔用比率大致相等：第一，特別着重於燃料方面的能源開發，佔百分之三十一；食品工業及其他輕工業佔百分之三十二；建築材料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九，其餘百分之八用於其他各種不同性質的工業。在此時期投資於農業的總額為九億四千七百六十萬土格里克，如果連用於包括畜牧事業之發展在內，則較前一個五年計劃期中投資農業總數增加兩倍之多。

第四期五年經濟計劃實施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在此計劃之下，工業生產率預計較前五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國家農場預期於一九七〇年可交出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穀類及生產二·二倍的牛奶，其他種類的農業產品亦同預估其增加生產。

從外蒙的經濟發展中顯示，其步人未來工業生產方向，事先已有準備，此種趨勢頗為明確。第一批外國資金進入外蒙是在一九一一年，當時中國本身宣佈由帝制改為共和，外蒙乃着手於生命短促的「獨立」工作。到一九一九年，外蒙已有三百六十三所中國人經營的小型企業，還有幾處蘇俄人設立的大型工業公司，而外蒙自己的工業此時尚在萌芽時期。雖然這些工商企業除了蒙古人之外，實際多雇用了中國人和俄國人，但工作人員的總數也只有四千多人而已。一九一三年外蒙開始審慎的努力嘗試於煤礦生產工作，當時是以庫倫附近的納萊卡（Nalaika）煤礦為開發之起點，但六年以後的一九一九年，祇有四十名礦工被雇從事於產煤。

外蒙的工業發展情形，直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尚無成效可言，後來在年青的蘇維埃聯邦政府軍事援助之下，由共產黨份子接管了國家政權。蘇俄所以立即大量經濟援助蒙古，並非基於仁愛友善的原因，而是決定要在西伯利亞的南方邊境培植一個忠實而政治目標一致的衛星國家。蘇俄於外蒙共產黨掌權以後將外蒙境內的俄人商業充公沒收後移交新的外蒙政府，成了外蒙政府的公產。新的工業計劃在蘇俄經濟與專門技術援助之下開始實行，烏蘭巴特的電力廠和兩

個皮革製造工廠的建立就是其例，但主要仍集中力量致力於工業方面的重建，以納萊卡煤礦而言，不但已陳舊過時，而且其產量亦不足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故亟需加以重建重組。

事實上，蘇維埃大量援助外蒙以大型工業機器設備，最重要是能源製造工業，並非直到一九三一年才開始。至於勞工力量的成長，從一九三〇年的一、四〇九人，到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二、〇六四人，這些勞工人數中有一半以上是蒙古人，然而在一九二七年全體勞工中祇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蒙古本地人。以前在蒙古的蘇俄和中國勞工人數是平均的，到一九四〇年蒙古的工廠就業人數是三三、一〇〇人，其中蒙古人佔百分之八十七、七，百分之五、七為蘇俄人，百分之六、〇六六為中國人。二十年後，勞工人數增加到二一〇、〇〇〇人，據一九六三年的報導，非從事農業的工人及其家庭佔全體人口百分之四十。

外蒙古在蘇俄援助之下的第一項大計劃是設立一座設備繁複的工廠，該工廠於一九三四年正式開工從事皮革製造、羊毛編織及生產皮衣。一九三六年又成立了一家專門製造毛氈的工廠，另一座生產羊毛衣服的工廠則於一九四〇年開始工作。外蒙古與其他很多國家不同，它曾致力於畜牧工業及其產品之發展，所以特別重視食品工業與其有關之輕工業，重工業則列為次要對象。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以輕工業而言是增加了二、四倍，而重工業僅增加一、八倍，燃料生產是重工業的主要項目。

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六四年這二十四年之中，外蒙的工業生產量增加了十倍。根據統計一九六四年的工業產品出口佔外蒙出口總額百分之四十一，而同年間輕、重工業的投資佔全國投資總額恰巧也是百分之四十一。至於輕工業的出口佔工業產品的主要部份（百分之五一），其中計有食品工業、原料製造及畜牧工業產品。自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國營工業與合作社經營的工業產品，其生產比率經常恒持不變，大約國營佔百分之八十，合作社佔百分之二十，此二者工業成長自一九六〇年開始後的七年情形，請參閱後面表列數字，可獲相當之概念。

事實上，外蒙古由於勞工缺乏訓練和國家的歷史背景缺點頗多，故重工業較輕工業落後，現則着重於礦源之開發，以致油、煤、錫、鉛、鋅、錫等礦產量增加，而能源工業產品亦隨之增加。舉例言之，電力生產量從一九六一到一九六六年增加了二倍，而工業總產量僅增加一、六倍。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四年外蒙工業產品價值表(單位：百萬土格里克)

工業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國營	四七·一	六四〇·一	四一六·一	四三〇·七	四六六·七	九四一·〇
合作社	一一·四	一五·四	一四四·一	一四四·七	二〇四·六	二六六·〇
總生產	五八·五	六五五·五	五六〇·二	五七五·四	六六九·三	一二〇七·〇

以上表列資料來源係根據：「一九六四年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情形統計」(Economy of Socialist Countries in Statistical Figures 1964)。「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科學學會」(Moscow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965)。「今日蒙古」(Mongolia Today)。「一九六九年莫斯科」(Moscow: 1969)。

工業生產量預期在第四個五年經濟計劃完成的一九七〇年可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在蘇俄援助之下，外蒙的計劃人員預測將增加機器設備以進一步發展輕工業，特別對羊毛織品加強生產，但重工業也是頗值注意之事。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沙倫果兒(Saryn Gol)煤礦之開採工作因發展地上開採礦物而告確定，此種地上開採礦物計劃將在外蒙多處地區實施產煤。一九七〇年在烏蘭巴特興建的熱電力工廠第一期工程即將完成，從烏蘭巴特經過新工業區的達克汗(Darkhan)到蘇赫巴托的第一條高壓電線將會連串起來。

工業上的蹣跚步伐

目前促成外蒙工業生產的重要工業，計有燃料、電力、建築材料、木材、化學原料、礦產、食品工業和輕工業中之皮類、肥皂及紡織品等，茲分述如後：

第一：雖然初期的石油工業可以穩定的開採，但外蒙的工業和鐵路所需之燃料來源，主要還是靠煤。迄目前為止，外蒙發現的祇有一種褐色的煤，這種煤由於易燃性頗高，長期貯藏容易發生危險。至於煤礦工業可追溯到一九一三年，當時庫倫附近的納萊卡(Nalaika)煤礦開始進行開採，到一九二二年僅存的幾座煤礦已經國有化了。納萊卡煤礦現在每年產煤六十萬公噸，該礦是在一九五七年由蘇俄專家技術協助之下才進入了現代化的生產。富納萊卡煤礦在海拔五千英尺高度的地方進行開採的初期，曾遭遇極大之困難，因其位於「永凍層」區域，土壤永久冰凍且深及一百五十英尺左右。該礦生產之煤質不佳，內有百分之八到十三的灰並含有百分之一到二的硫磺。此種煤塊有碎為微粒的性質，故經長途運輸極易破碎毀壞，其易燃性極高，納萊卡產煤區現有十座煤礦生產之中，百分之九十的煤層在不同深度之下從二、五英尺到十五英尺的厚度。

大約十年以前，納萊卡是全外蒙僅有的第一重要產煤地區，從那時候開始在若干愛馬克地區陸續開發了很多新的煤田，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是沙倫果兒(Sarkh Gol)，其地位於蒙古北方的沙倫果兒河附近，這種普遍開發煤礦的工作都是在蘇俄技術援助之下進行的。捷克和波蘭兩國則協助外蒙建造水泥廠、磚廠、電話交換機及礦工寮等。一九六三年蘇俄協助外蒙建築一座從打克汗到沙倫果兒的鐵路，並興建一條長達三十一英里的高壓電線，沙倫果兒的煤礦於一九六五年開始生產，熱電力工廠則於一年後完成。該礦每年產煤能量為一百一十萬噸。

其後，外蒙各地區的煤礦亦陸續開採，生產較多的礦場位於善香打(Sahn Shanda)·阿爾(Aduna)·竹魯(Chulun)·亞巴爾(Yabar)·奧得賽特(Oldziyt)和渣幹諾布(Tsagaanoboo)等處。還發現有煤的地區為肯特山脈(Kentei Range)·阿爾泰山脈(Altai Range)和北方邊界與南方邊境，此兩處有橫跨到達蘇俄與中國的蒙古鐵路。另外在莫楞河(Muren R.)的山谷有一處煤礦，距恩道克汗(Undurkhun)約五十英里之遙，該地煤量甚豐，厚度達十五英尺。一九六一年以前的外蒙，其煤產已可自給自足了。雖然其煤產量有顯著進步之趨勢，據報導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公噸，不過一九六四年尚未到達年產量一百萬公噸的目標，此一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七年為止。

第二：石油工業在外蒙是一種新興事業，它是在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期間才開始着手進行，不過這種工業發展的情況並不理想，原油產量與其他油類的生產僅能供給外蒙油類需要量的半數，不足之量則由蘇俄進口。

當蘇俄掌握之「蒙古石油勘探開發公司」免稅將有關設備運抵外蒙之時，外蒙石油工業才獲得一種極有價值的推動力。第一次的油田開採並開始產油是在一九五一年，其地點則在東戈壁地區的善香打(Sahn Shanda)之南。不久之後，在陳戈壁愛馬克(East Gobi Aymag)建立了一座石油提煉廠，廠址所在地名叫宗貝恩(Dzunbayan)，該廠在蘇俄技術與經濟援助之下製造汽油及提煉其他原油，油料是經由善香打油田所供應。宗貝恩位於戈壁沙漠的心臟地區，預期將成為外蒙石油提煉工業的中心，此處的提煉設施會作規劃，目前仍在發展之中。

此處每年的石油總產量是在一萬八千噸到兩萬噸之間。目前已知頗具石油生產潛力的「頁岩油」蘊藏之處，主要是在中央戈壁和南戈壁的愛馬克。

第三：外蒙的電力與煤之生產關係非常密切，因為發電廠以煤作為燃料。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外蒙的電力生產頗有進展，因而使達克汗成為新興工業的發展地區，此地位於烏蘭巴特之北約一百五十英里，早期是橫跨蒙古鐵路中的一座小火車站。該處之所以開發，主要是受到以蘇俄為首之「蘇維埃集團聯

合各國經濟互助委員會」組織全體會員的支助，現在達克汗施工中的一座大型熱電力工廠就是發展工業中的主要計畫之一。

一九二四年，烏蘭巴特的電力工廠是外蒙唯一的發電廠，發電量是六十基羅瓦特，主要為供應家庭使用。一九二八年，在烏蘭巴特建造了一座機械工廠，因而具有一百一十基羅瓦特能量的電力廠興建完成，到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百基羅瓦特。三年後在此「首都」所在地成立一處工業發展中心，接着一座電力廠也建築起來，可生產二千五百基羅瓦特的電力，那些日子中外蒙頗獲相當的成就。到一九三九年該工廠的發電量幾乎到達了一倍。一九六三年烏蘭巴特的全部電力工廠發電量已達到三萬五千基羅瓦特，一九六五年則接近六萬基羅瓦特。其次是蘇赫巴特發電廠有六千基羅瓦特，在喬巴山的發電廠則有三千基羅瓦特。

在達克汗的發電廠完成以後，不僅能供應當地四十家工廠及靠近沙倫果兒礦區的煤礦動力，並且也可對相當距離內的都市和鄉村地方供應電力，這地帶勢將成為外蒙的第二工業大都市。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外蒙發電總量應為二十萬基羅瓦特左右。

第四：由於新都市的形成與舊都市及鄉鎮的擴展，外蒙工業中的建築材工業是發展最快的一種，堪稱一枝獨秀。為了解決郊區居民住的問題，建造大量房屋自屬必要。就整個而言，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建材生產情形，據統計增加了十倍之多。建材的生產佔外蒙工業總產量約百分之十一，全體勞力中有百分之六從事於建材工業。最重要的材料是磚頭、石灰石和毛氈。毛氈是大量用之於蒙古包周圍的遮蓋。那圖帳篷仍然是蒙古風光的點綴品。不過，蒙古生產的建材種類正在不斷增加之中，目前實際生產的有玻璃、矽酸塩、瓦、水泥混凝土等。波蘭與捷克兩東歐共產國家曾援助在達克汗建造水泥工廠及矽酸塩工廠。目前一座專門生產預鑄混凝土窗方格之工廠已在達克汗設立完成，另一座新的預鑄房屋工廠則在烏蘭巴特建造完工。

第五：據說蒙古的林木資源有一萬萬兩千五百萬立方公尺之多，其中有一萬萬立方公尺之森林多位於北方和山區地帶。柯布索加(Khubsogai)與肯特(Kentei)是將來發展森林工業最適當地區。該處可能已有四百五十萬立方公尺的林木遭受砍伐，但無損於外蒙全境的林木資源。外蒙的多數木材是經過鄂爾渾河(Orhon R.)·色楞格河(Selenga R.)及克魯倫河(Ke-rulen R.)運送出境。為了充分利用外蒙的林木資源，建立一座良好的運輸系統自屬需要，而外蒙目前就是缺乏這種運輸系統。

木材工業佔外蒙總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十三，其主要是供應木材加工工廠使用，這些工廠包括烏蘭巴特的家具工廠和蘇赫巴特的房屋預鑄工廠，另外於一九六〇年由蘇俄援助在渣巴汗(Dashkhan)和烏巴杭愛(Uber-Khanda)兩個愛馬克地區成立了兩座預鑄工廠，每廠每年以生產一千五百棟標準房屋

為目標。這些工廠中的木材廢品則用以造紙和製造火柴。外蒙第一座造紙工廠於最近建築完成，每年生產白報紙、包裝紙和紙板的總產量預定是三千五百噸。

第六：雖然外蒙具有其原料資源，但化學工業却非常落後，其最大企業算是設在宗伯恩（Dzunbayan）的煉油廠，坐落於喬雷恩（Choreyn）的工廠年產工業用酒精據說是九十五萬加侖。烏蘭巴特的一座製藥廠僱用的人約有五百名。距離「首都」二十五英里遠的一處工廠係由匈牙利援助建造，生產生物化學品，主要為供應獸醫之需要。

第七：礦產除了煤礦以外，外蒙主要是從事礦產提煉與礦沙的輸出以賺取外匯。前在達克汗曾計畫成立一座「冶金中心」以提煉鐵沙，但迄目前為止仍着重在非鐵金屬方面，以出產於肯第和蘇赫巴特兩個愛馬克地區之錫、鉬和鎢的開採為主要努力目標。一處靠近戈壁沙漠的梭蓋黑汗山脈（Zorai Khairkhan Mountains）的新錫礦，預期將成為外蒙的最重要礦產之一，錫礦同時在中央愛馬克（Central Aymag）也有所發現；錫和鎢礦則在南戈壁、東戈壁以及中愛馬克地區勘測發現。據研究在柯布索加湖（Khubsungui Lake）附近，在杭愛山脈（Khangai Mountains）、在東戈壁和拜彥杭高愛馬克（Bayan Khongor Aymags）等地儲有銅礦，而在肯特山脈、在汗蓋、在蒙古阿爾泰與戈壁阿爾泰山脈的，靠近阿布索加湖則儲有銀礦。

第八：蒙古人的最古老的職業之一就是打獵，因其全境之內野鳥和野獸極為豐富，特別是生毛動物如黑貂、銀鼠、海獺、松鼠和山貓，這些動物多聚居於北方和西方的山區之內。大草原和森林與草原混合地帶有大量的山獺鼠寄生其間，其皮毛為外蒙主要出口之貨物。每年約有二百一十萬頭山獺鼠的生皮被加工製造。松鼠、狐狸、犴狴和狼的皮毛也是大宗加工的物品。

第九是漁業方面，雖然最近有幾處湖泊和河流進行規畫為捕魚之用，但外蒙的漁業情況仍停留在原始階段，魚群迄未作大量之捕捉，顯示其將來頗具遠景。若以現代方法捕捉，估計年產量可達三萬公噸，而目前實際年產量祇有八

百到一千噸而已。

第十是合作工業，外蒙在工業生產方面，約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係來自工匠的小型合作製品，他們所使用的是當地出產原料。合作工業多數是生產消費品如鞋襪、衣服、蒙古包和毛毯，陶器與刺繡製品也是由合作社製造生產的。十一，食品工業佔外蒙工業總生產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但其僱用的勞工人力僅佔全體勞工百分之十五。目前外蒙集中力量對牛奶加工生產（佔食品工業總產量約百分之四十一）及肉類之生產（約佔食品總產量百分之十四）。

乳酪是由分佈全境各小型農場所生產，但都集中在東部地區。其中大多數仍在初步開發階段，產品方面尤其是奶油需要在烏蘭巴特再行加以精製。外蒙現代化的奶油和乾酪製造工場係於一九四〇年首次成立，而目前這種型態的工場已經增加，其中最大的一座工場是設在烏蘭巴特地區。

十二，輕工業在外蒙工業生產總額中佔百分之二十五，與食品工業相等。烏蘭巴特工業聯合中心年產皮貨約一百萬件，是外蒙最重要的工業，這種工業最近在捷克斯拉夫的支援之下再行重建；還有一座人造皮工廠最近在蘇俄、捷克和東德的機器援助之下也重新開展，現在可年產皮鞋三十七萬雙，鞋底三百五十噸左右。

在烏蘭巴特的其他輕工業包括有：一家由東德援助的印刷廠，一座日產家庭用肥皂四、八噸和化粧用肥皂一萬二千塊的肥皂工場；一家火柴工廠可年產火柴三千萬盒。另外在達克汗有一座紡織廠，一家小山羊皮工場和一座毛毯工場。

按：外蒙古位於我國北方邊陲，北鄰蘇俄，若千年來俄帝處心積慮，藉地利之便以政治軍事壓力與經濟侵略交互使用，從根本上亦化外蒙，迫使外蒙成為其附庸國，已為不爭之事實。本文作者彼德羅夫對經濟方面之敘述，資料來源均係根據蘇俄或外蒙之官方報導，故其種種經濟活動與一般工商進步國家相比較雖屬微不足道，然其資料數字仍難免多有誇大不實之處，敬請讀者注意。

譯者謹誌

西域塵談 (四)

西域的黎明

漢族的西方起源說

自一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末，歐洲學術界，謂漢族及漢族文化之起源，應求

羽田明著
宋念慈譯

之於西方的呼聲高唱入雲，此在前文裡已稍為提及。這一學說亦即是說，漢族乃自西方的某一文明地區，攜帶着既成文化，移往到黃河的中、下流域，亦即所謂中原之說。

在許多學者中，對西方起源說最熱心、主張最力者，厥為法國的東洋學者拉庫佩利（Lacouperie, Albert Terrien de (1845 ~ 94)）。他在

他畢生的大作「中國文明西方起源論」(一八九四)之中，力陳漢民族乃目巴比倫之移住者。漢字與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相類似，形成東西文化之要素，在某一點上是相通的等等說法，都是西方起源論者經常提出的問題。拉庫佩利在這一點雖沒有太大的錯誤，可是仍被人評為「與其說是一位科學家，毋寧說他是一位極富文學空想力之人，他將中國古典的「百姓」，指為出現於巴比倫之記錄的巴比倫族，謂中國的始祖黃帝，即為侵入巴比倫的耶拉姆之王克多納昆德，以為自己學說的歷史證據。

將神話或傳說與歷史相混同，這是以福祿特爾 Voltaire (1694-1778) 為始的一八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們，所已深引為戒的。雖然如此，漢民族來自西方之說，仍舊強烈地繼續為人所主張，說起來也不無道理。就中影響較大者，即白人較諸有色人種優秀的思想，總之，流行於歐洲的一宗頑固的迷信，纔正是形成這種學說的底流。譬如，連斷言巴比倫起源說無非是迷信的李希霍芬，也說漢民族的原住址，應求之於被稱為阿利安人之故鄉的西域。

而當事者的中國本身，對足以打破歐洲人所倡的西方起源說，也沒有具備現成的根據，這也有其原因。此即直到二〇世紀的最近，在中國本土上的考古學並無相當進步，因之，先史時代之事可以說全無所知。

印度被稱為「無歷史的國家」，然相反地，中國在很早起，便已寫下了很多歷史書籍。但這些史書都因受到佛教的影響，把太古的神話和傳說，都完全用歷史事實的體裁記下，說是從數千年前的遠古起，便已有了統一的大國，也有其完成的文化。而在長遠歷史時代之前的先史時代和石器時代之事，則幾無所知，故當然亦無法對西方起源說，從正面加以否定。

據對中國史和東西交通史深具研究之名人希爾特 Hirth Friedrich (一八四五—一九二七) 說，「祇要根據中國可靠信賴的文獻，便沒有必要考慮漢民族起源於西方之說。」若然，則漢民族之原住地究為何處，他說似應向相當於中國之西北部、西域的「走廊地帶」的甘肅地方求之。

這樣，從正面否定西方起源論，仍屬困難。

青銅器文化來自西域？

由於北京人發現於先，接着更有多數先史時代的遺跡和遺物續被發現，這在原中國人和原中國文化之存在，已被確定了的現在，漢民族與漢文化起源於西方之說的影子，日趨淡薄，自屬理所當然之事。不過，另一方面，又由於彩文土器之被發現，又另引起了有關中國文化起源的新問題。

關於彩文土器(彩陶)上文業經談過，然則彩陶文化對中國文化之成長，究竟有何貢獻？

現在一般所思想者，厥為彩陶在中國原始農耕文化發達上，它究竟擔任過何等促進的任務。譬如，被視為西域之代表的彩陶文化遺跡之阿陶等，對大小

麥之種植、牛馬等家畜之使用、灌溉水路之構築等事，均極顯眼。從彩陶文化遺跡阿陶所顯示的這種現象，彩陶與原始農耕文化，經常是處於互相結合的關係，想到這點，在中國是否也有同樣情形？不過，說到中國，大麥之事姑且不論，至於小麥種植的推廣，乃遠在彩陶時代之後，總比公元前更為在後，至於在農耕方面使用家畜、灌溉設施之普及，恐也不能遠溯至公元前五、六世紀以前。故目前，究竟何種作物或農耕技術，是與彩陶一起傳至中國，在這一點還弄不清楚。何況談到彩陶對農耕文化之發達，究竟負擔了如何促進的任務，自不能不懸為疑問了。

其次，我們再思想一下對中國土器製作技術的影響。在彩陶傳來以前的中國，早已有了特有形狀或樣式的不太精緻之灰白色土器，亦即所謂粗陶是也。然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之中葉起，在黃河的中下流域，出現了一般所稱的黑陶土器。黑陶的燒成度比彩陶為高，既使用了轆轤，又在碗盤上做了底托，在技術上亦為一種較為進步、具有光澤的漆黑土器，而在其表示為青銅器之原型的一點上，可說是純粹的中國土器。於黃河上流流域，彩陶文化長時間開花期間，在會一時造成了彩陶的黃河中、下流域，比較彩陶更為快速地轉向了黑陶。這種黑色土器無疑為在土著粗陶上，更加上彩陶的製作技術，而臻於發達的。當黑陶進入了使用期間，出現了具有城牆的都市，出現了文字，這已是接近歷史黎明時候。中國最初的確實歷史王朝，殷商，據推想即為推行此種黑陶文化者所建立。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加以想像地觀察，中國青銅器文化的起源，也似與彩陶文化之傳播有關。在西亞方面，從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五〇〇〇年新石器時代之末期起，直到公元前二五〇〇年的青銅器時代初期，彩陶的製作極盛。在阿蘭，據推定即繼續到公元前七世紀，或前六世紀的鐵器時代。黃河上流流域的情形，也幾乎相同。然在黃河的中下流域，相當於殷代中期的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之中葉，它正處於非常發達的狀態，可以說，它乃是在突然間開始了青銅器時代。這種說法是說，所謂中國的青銅器文化，並非是自己的創作，乃是在想像中，和彩陶文化一同由西域方面所傳來。

尤其是在殷代中期以前之考古學的研究，尚未充分發展的現狀之下，若將彩陶文化和中國青銅器，直接連結在一起，這恐怕也沒有明確的佐證。若說在黑陶製作方面，運用火力業臻熟達之境之中國原人，並沒有親手發現過青銅器製法之可能性，也殊不合理。

鐵改變歷史

關於中國青銅器文化之起源，尚有不盡明瞭之點，前文業經談及。但說到由公元前六世紀起至公元前五世紀，亦即在春秋時代之中期以後，在中國開始使用鐵器之事，可自鐵字在古時，乃以金與夷(外國人)合成，而寫成鎮字，

從這種書法也可推測出，它本來或是外來的東西。

據說鐵器的起源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然世界上最初想出大量製鐵方法，盛行使用鐵器的期間，還在其後很久，即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之後半，以小亞細亞為根據地，並在西亞活動的希太人 *Hittites*。鐵器的製法，自此希太王國衰微之後，方始公開。於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以後，傳往舊大陸各地。阿蘭遺跡之第四層亦相當於此一時期，因之，在時期上較此為晚的中國鐵器文化，仍然是來自西方。總之，以傳自西域之想法為自然。

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時，因武力革命而取代了殷商的周朝，在其所製青銅武器上，可以看出像是西域系的紋型，在周朝東遷（公元前七七〇）之後，由渭水盆地又興起了秦朝。這個國家進入戰國時代急遽強大起來的原因之一，殆即由於率先他國接受了鐵器文化的關係，史記的實殖列傳裏，也特別記載秦擁有北狄西戎馬牛羊，以及巴蜀之銅鐵等資源之富。

據近年蘇俄考古學家之研究，西域由於接受鐵器文化，而使農業生產獲致飛躍的發達。綠洲國家亦因而強大起來，而即屬在中國，其所以成為成立秦漢古代帝國之地盤者，可說仍是由於鐵器文化之導入。

然下列各點為中國鐵器文化的特異點，實有應予特別注意之必要。因在大體上，鐵的鑄造至為困難，故普通都是最初鍛鐵首先使用於武器，接着乃在農業器具方面加以利用。然在中國，鐵製的刀劍之類的見諸普及，還不過是秦漢帝國時代以後之事，鋤耨等農具實發達於先。

在青銅器時代，雖所使用的武器與祭器為青銅製品，但在農器具方面，普通仍使用着石器時代的木製品。在伊期與阿富汗的農村等地，目前仍可看到與此相近的鋤與耙子。中國一直到春秋時代的中期，一般仍實行着由二人操作的木製鋤之耦耕。等到帶有鐵製刃的鋤做成之時，由牛牽引的牛耕，也隨着出現，更由於深耕、施肥、及儲水池和灌溉水路之設立與技術改良之配合，使農業之生產，獲致了重大的發展。

其次，有件事在此須預先提及，那就是在中國方面了解鑄鐵技術，似乎較早，戰國時代的斧頭等等，都為上等鑄鐵製品。不需要像刀劍類那樣銳利的農具，其使用鑄鐵製品，似乎意外地提早實現。那是否不久就傳到西方的羅馬帝國，以「賽來斯」(Seres) 的鐵一而聞名於世？所謂 *Seres*，乃希臘與羅馬人稱呼中國人時，所用的名稱，它具有「絲綢之人」的意味。

質言之，使古代中國之農業生產，得臻飛躍發展，並進而使秦漢帝國在成立上，能造成其經濟地盤者，正是此種鐵器。

農業及鐵器的關係如上，另一方面在軍事上的關係又如何呢？殷周時代與古代的西方世界一樣，中國也是採用了以戰車為中心的戰術。在歷史有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國」，這就是說這是一個可以動員千輛戰車或萬輛戰車的國家

之意。不久變為機動戰，騎馬戰術的影響，造成了統一中國的軍事基礎。騎馬戰術並非來自西域，而是自游牧民族所傳來。說起來也很奇怪，它在武器中使用鐵器，恰為同一時期。

神話與傳統中的西方因素

對中國文化由西方而來的影響，可以想見是以種種形態，又是經過了不同時代的。

中國由春秋到戰國時代，學者與思想家輩出，歷史上稱之為諸子百家，中國的精神文化至此呈現了空前絕後的發展，並臻於成熟。在同一時期，在西亞方面，古代波斯帝國正面臨全盛期，也是亞歷山大王實行東征，西方勢力猛烈東進的時期。

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有許多學者認為巴比倫、伊蘭、希臘、或印度等地域之文化，曾給予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化之發達以重大影響，自屬當然。以英譯中國古典而聞名的勒格 *Legge*, *James* (1815 ~ 1897) 曾說老子思想源出印度，而在歐洲天文學家之中，也有不少認為中國之天文、曆法，是受了西方影響。

就中有很多學者認為在先秦時代的談話與傳說之中，混入了西方的要素。例如，法國的東洋學者馬斯佩洛 *Maspero Henri* (一八八三 ~ 一九四五)，在其所著「中國古代史」一書中，便曾談到春秋戰國時代外來文化的影響，像上文業經提到的崑崙等說，實為印度隊商所傳，謂位於世界之中央，有諸神之住處，並有四大河自該處流出的印度梅爾山的神話。

不過，雖然說西來的文化有其影響，但是它不一定僅通過西域一地而至中國。以四川、雲南方面的原有居民之西南夷為媒介，連結中印之交通，此已為現在的定說，熱心主張在秦的神話傳說中含有印度要素之藤田劍峰博士（一八六九 ~ 一九二九）等人，亦指稱自印度通往中國的經路，即為此條路線。但考究精神文化時，又與物質文化的情形不同，如非有確實證據，便很難確切證明外來文化的影響。馬斯佩洛等晚年的態度也有了變化，甚至再三強調中國文化有其獨立性了。但是，譬如一經談到漢字等問題，便說有的漢字的本身並無意義，無論怎樣想，總覺得其中有僅能作外來語的音譯之判斷的古語。「闕羣」（梵文羣也），「狻猊」（梵文獅子也）等均為其典型。在這種情形下，仍不能不認它為外來語。雖然如此，已經成為基本字的外來語之古老形狀，因為不一定能再分辨清楚，故難於確定原本不是音標文字之漢字古音，實為研究語源的困難所在。

總之，目前對於追溯至先秦時代之西方文化的影響，縱令尚不充分，但可說業經確定，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化飛躍發展的背景上，如想像它和西方世

界具有何種關係，母寧說是極為自然之事。至於找出決定性的證據，那就有待於將來了。

周穆王的西征

穆天子傳為最初記錄東西關係的文獻，自一九世紀以來，即引起學者之注意。

據傳，晉咸寧五年（二七九），土民們於盜發戰國末期魏王墳墓時，發現竹簡數千枚，該項竹簡其後幾乎完全遺失，然在剩餘部分中却留有此書。其體裁與內容，相信均與原樣無異。

普通均認為穆天子是周朝第五代的天子，穆王。「穆天子傳」裏說這位偉大人物率領大軍，遠征到極西的崑崙山附近，並記載着會見西王母的經過。我們不能說它是以描寫夢幻一般的崑崙山，和神秘不可解的女王西王母為主題，便說這篇故事為一篇神話或傳說。許多學者都處心積慮地想從這篇故事之中，找出歷史事實。在這樣學者之中，於解釋這一故事之時，不得不承認分成了兩個不同的立場。其一是說這篇正如它所傳述的，它記載的是曾以征討西北異民族犬戎，因而知名的周穆王（公元前八世紀）的歷史事蹟，另一個立場是，這篇故事不過是「已稱霸於西戎」並已確立秦朝勃興之基礎的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二一）的事蹟，託周穆王之名加以傳述而已。

在這兩種立場之中，究竟那方面正確，因均無決定的證據和確證，所以很難說，如以之與本文開始時所介紹的山海經，或為書經中之篇，亦即春秋戰國時代，以擬古的目的而寫成之地理書「禹貢」相比，則穆天子傳的內容記述，似乎也並無特別古老的理由。可是，這本書中所顯示的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比山海經和禹貢，寬廣多了。由這點來看，這部書的成立，大概不會早於春秋戰國時代。在這種前提之下看，

「（被認為是主人翁的）穆王所登的崑崙之丘，在今涼州之南的古浪縣，（女王國）的西王母之邦，還在離此甚遠的西北，應在天山之東北端的巴里坤地方，（據說穆王在該處與西王母相會），瑤池可推定為漢之蒲類海（巴爾庫爾湖）。

又小川琢治博士一個具有相當決定性的結論說

「穆王西征的路線……由包頭渡黃河河套，由寧夏橫貫阿拉善沙漠（向古浪縣、涼州、甘州、肅州、安西，穿過南西北路的綠洲，而達天山之東北端。這一通路即戰國時代，崑崙之玉輸往趙國的路線」。

這也是令人首肯的。

自漢代，公元前二世紀以後，西域歷史的大部分，由於中國方面的記錄，都已臻於明白。雖然如此，像上文所說，中國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地理知識，無

論他們看得怎樣寬廣，恐怕也僅祇於觸及西域一部分的程度。而且關於塔里木盆地地方的史前考古學研究，較諸俄領中亞在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不發達的。所以我們雖然在進行西域史的描繪，仍不得不先從帕米爾以西的阿姆、錫爾兩河地方，亦即歐洲人所謂的河中Transoxiana開始了。

高台上的城郭都市

河中的農耕文化，不像阿姆河與錫爾河那種大河流域一樣，它是位於從現在的土耳其曼共和國之南境的科貝特塔格山脈之北麓開始。由山中流出的小河水，一到增水期，即溢出河岸。人們即在此被水後的柔軟土地上播種。這已是公元前五、四〇〇〇年紀，新石器時代的事了。久已被視為中亞唯一史前時代遺跡的阿姆遺跡，也是屬於這種初期農耕文化階段的居住遺址之一。

開始於公元前四、三〇〇〇年紀的青銅器文化之發達，據推測乃為阿里安民族自中亞移往印度和伊朗的有力因素。而與此移動相前後，居住於中亞之人的生活，亦逐漸發生了變化。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的中葉起，至前一〇〇〇年紀之初期，以前的貧窮村落，漸漸為人所捨棄，人們都為了尋求新的土地，進而尋求新的生活，開始了旺盛的移動。農業的生產用具和生產技術，一經進步，便由山麓的狹小土地，移向大河流域居住，由於開發了灌溉用水，已足以養活增加中的人口。在這期間，村落之周圍，甚至也出現了防禦的牆壁。

時代急遽下降到公元前七、六世紀左右，城郭都市出現了。在高台之上有城堡，在其周圍聚有多數民家，形成為都市。這種都市的總面積達一六公頃，在高達八公尺的用日晒乾的土坯所建基壇之上，甚至也可看到所建的城塞遺跡。灌溉網的發達極為顯著，由大河引水的幹線運河或水渠，像樹枝一樣，分流向廣大的地域，潤澤土地。

這時，鐵器在中亞綠洲地帶的廣泛使用，已成了都市和灌溉設施之發展的促進劑，具有宮殿和神殿的城堡出現，為了有組織地實施大規模的灌溉工事，確立了權力機構，形成了足以稱為綠洲都市之國家。惟尚未見有文字使用。

較為遺憾的是，關於這樣形成的都市國家之歷史，竟無可瞭解。因為沒有殘留下來的類似記錄的記錄。但從遺跡的規模和構造看，仍可藉以想像出於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在阿姆河下流地域的花刺子模和上流流域的巴克特里亞（大夏都城）地方，似都有相當大的國家存在過。再者，由遺跡中所發現之遺物，尤其是看一一下其中所有的某種土器之形狀，或製造方法，都可發現巴克特里亞（大夏）、粟特（康居）、花刺子模、呼羅珊、安息等由河中到伊爾東北境的諸地方，正表示着一個共有的文化。這件事是說，它令人想像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諸地方，到某種程度上，在政治方面也是統一起來。

希臘歷史家赫洛多托斯Herodotos等說，在古代波斯帝國出現以前，在

此一地方最具有勢力者，為花刺子模，而巴克特里亞之成為中心勢力，也許是在古代波斯帝國以後之事。無論如何，花刺子模也好，巴克特里亞也好，它們一定都是具有抵抗力的文化、政治中心地。根據其後的歷史，一般地說，河中各國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關係很深，就中花刺子模與游牧民族的團結至強，較諸其他各國和各地方，無論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相信均具有格外顯著的獨立性。

游牧民族的防衛

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之末期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紀之初，伊蘭民族由中亞突破伊朗高原，到達伊朗西部。原本受有西亞文化影響的河中伊蘭系居民，其後與西亞之連繫，更行加強，自不難想像。自公元前六七三年左右到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建都於阿克巴它納（現在伊朗之哈馬丹城）的伊蘭民族之最初的國家。米底亞王國的領域，約自裏海東南岸的悉爾卡尼亞起，伸展到安息。但這一王國與河中的關係，則不明瞭。

伊蘭的民族宗教，拜火教的教祖瑠羅斯德為米底亞人，傳說他殉教於巴克特里亞的都城巴克特拉。惟其生存年代並不在米底亞王國時代，有人認為次一個古代波斯（亞克美尼朝波斯）之初期，出身地或為巴克特里亞，或謂為花刺子模，無從確定。

供職於亞克美尼朝宮廷的希臘醫生庫達西阿斯（前五世紀）說，併吞了米底亞的居魯士大王（公元前五五九—五三〇年在位），於統一了西亞各國之後，數年之間，由裏海轉戰於西北印度之間。結果巴克特里亞、粟特、呼羅珊（瑪爾基亞納）和花刺子模等，都被納入古代波斯帝國領土。在藥殺水 Yaxartes（今名錫爾河）沿岸，築了不少城塞。築城的目的是在防衛越過此河入侵之北方游牧民族，這些民族包括着希臘人所說的喜泰族和塞迦耶族，以及波斯人所謂的薩卡族等游牧民族。

這位居魯士大王所建築的城塞之中，位於最東的居魯波里斯，據推想即為相當於薩馬爾罕之東北、俱戰提 Khondab 之西南的烏拉秋貝。當時該地或為粟特之東北境也。

其後，居魯士又自錫爾河攻進北方薩迦族的居住地，據說他墜入該族的衛中而戰死。詳細記述這一事件的赫洛多托斯，指此薩迦族為麻沙給台（吃魚之人）人。由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看，相當於史記和漢書所記載的康居或奄蔡（後來的阿蘭人、阿斯人）。但問題在於也有人說薩迦族是達城。達城是曾居住於錫爾河下流的部族，後來侵入安息，建立安息王國的帕爾尼民族，似即其一部。中國歷史上則稱之為「大益」。

大流士大王

繼居魯士之後者，為其子坎比塞斯 Cambyses（公元前五三〇—前五一二在位）。他於征服埃及及歸途死亡，大流士一世（公元前五一二—前四八六在位）繼王位。此間經過，赫洛多托斯在其所著「偽斯梅爾狄斯事件」中，遺有詳細記載。

坎比塞斯於遠征埃及之前，暗殺其弟斯梅爾狄斯，該事付之秘密。斯梅爾狄斯曾為巴克特里亞、安息、卡爾馬尼亞等地之太守，聲望頗高，為其兄所忌。坎比塞斯出征後，一名與斯梅爾狄斯面貌相似的好僧，冒稱自己為斯梅爾狄斯，出面爭奪王位繼承權，樹叛旗於愛克巴塔納。坎比塞斯得悉後，大怒，但不幸於歸國討伐途中死亡。

大流士一世平定了假斯梅爾狄斯以及以欄巴蘭、巴比倫、阿爾美尼亞等地的叛亂，方纔把行將解體的帝國，回復到統一的局面，在馬爾基阿納鎮壓了夫拉大的叛亂，此役被殺者在五萬人以上，俘虜者達六五〇〇人。

削平了馬爾基阿納（即呼拉珊之舊名）及安息等河各地的大流士一世，乃着手於征服塞迦族，又把這族重新置於亞克美尼朝支配之下。大流士的軍隊雖沒有進軍喀布爾以南的跡象，犍陀羅（現在的白沙瓦）地方似與花刺子模，同為亞克美尼朝的屬州。這由克塞爾克塞斯一世 Xerxes I.（公元前四八五—前四六五年在位）遠征希臘時，在其軍隊之中，有花刺子模人和印度人參加，從可知矣。

此等事件的經過，俱見於大流士大王本身手筆所撰的碑文。

巧智的商人

沿着自巴格達通往哈瑪丹的街道，在克曼沙 Keumashan 之東約三〇公里地點，有一名叫貝悉斯吞的地方。貝悉斯吞即「神的地方」之意。此處除流經南面平地的河川之外，還有由地底流出的滾滾清泉，眼前固然僅為一擁有三家茶館為中心的小村，但往昔則為騎乘駝馬往來客商의 打尖住宿之處，自然應該相當繁榮。

在其北面有一座巖石的峭壁迫近街道。在這斷崖中腹的壁面上，雕刻着用楔形文字所書寫的波斯、以欄、和巴比倫三種國語拼成之紀念大流士一世戰功的記錄及其肖像。這就是貝悉斯吞的碑文。此外，大流士最初的首都佩爾塞波里斯，及夏都阿克巴塔納的近郊，也遺有同樣的碑文，在上埃及也發現有非常相似的碑文斷片，尤其是很早便為西歐人所知，而由樓林遜做為解讀楔形文字之關鍵者，亦為此處之碑文。

浮雕刻畫着大流士一世帶領着兩名武將，用腳踏着好僧高馬塔 Gaumata，亦即偽斯梅爾狄斯，牽着包括塞迦族在內，九名如同念珠一樣綁連在一起的主要叛逆，並接受有翼神阿夫拉、馬茲達祝福的畫面。波斯語的碑文共四一行，全部均為大流士自己的話，首先記述者為他的系譜和被征服國家之名稱，其

次則記述平定高馬塔等各地反亂經過，並顯示自己是「萬王之王」的勳績。

在此所列舉的各國之中，當前最引人注意者厥為：巴爾塔瓦（安息）、哈賴瓦（阿里亞、赫拉特地方）、烏瓦拉茲米亞（花刺子模）、巴卡特利修（巴卡特里亞）、斯古達（粟特、康居）、塞迦、犍陀羅、信度或身毒等各大地方。居魯士被譽做「充滿慈愛的」父，坎比塞斯被譽做「壓制的」主人，大流士一世被譽做「明智的商人」，其中大流士一世的明智的商人之風貌，確實當之無愧。因為他在這些地方，建立了整然的稅制。赫洛多托斯也指出，大流士一世所決定徵稅的二〇個州（沙特拉比）之中，即舉出巴卡特里亞、塞迦人、安息人、花刺子模人、粟特人、阿里安人、印度人的名字。由各該州所徵收之稅，皆用於支持波斯帝國的世界國家。

在古代波斯帝國東方各州，巴卡特里亞在河中尤占最重要地位，被坎比塞斯暗殺的斯梅爾狄斯，即曾為此地太守，協助大流士一世平定馬爾基阿納叛亂的達達爾修，以及後來反對阿爾塔克塞爾斯一世（公元前四六五—前四二四在位）繼承王位，並與之相爭的哥哥喜斯達斯普，也曾為巴卡特里亞的太守，這一州的太守，似乎均由亞克美尼王朝之一族，尤以王的近親以太守或副王的身分，前來鎮守，以便統轄東部諸州，成為慣例。

粟特被人認為與安息、花刺子模等，屬於同一徵稅區（州）。粟特的中心，即希臘人所謂的馬拉堪達，亦即後世的撒馬爾罕。亞歷山大大大攻打馬拉堪達時，這地方有內外兩城，每城均由城牆圍繞，據謂外城牆之長為一三公里。阿夫拉夏普的廢墟，即與此地相當。

與撒馬爾罕齊名的不花刺的名稱，在亞歷山大東征之記錄中，亦未出現。學者之中，也有人以為馬拉堪達為粟特（Sogdiana）的都城之一，僅記載為粟特Socet者，即為不花刺（布卡拉）Bukhara, Bokhara）。美俄的考古學家因為從事於粟特地方之發掘，而使文獻上向來未弄清楚的公元前八—六世紀左右之此一地方狀態，臻於明瞭，但古代波斯帝國時代之事，幾乎尙無所知。

巴卡特里亞的希臘人

古代波斯帝國，由於阿爾塔克塞爾斯三世（公元前三五九—前三三八年）在位）之被毒殺，事實上已歸解體。

公元前三三一年，在高迦梅拉決戰中失敗的大流士三世，逃至東方，但遭巴卡特里亞太守貝索斯所殺害。亞歷山大大大帝於公元前三二九年討貝索斯，入巴卡特里亞，更窮追越嬌水，進入粟特（康居）。嬌水即今之阿姆河。粟特地方之所以稱為河中（嬌水對岸之地）者以此。

亞歷山大的東征，僅為十年的短暫時間，然征服巴卡特里亞和粟特，已耗

去了其中將近三年的歲月。這件事說明了會為古代波斯帝國東方重要基地之這方面的居民，憑藉着城郭都市，該是如何頑強地抵抗了希臘軍隊。以出產名馬而飲譽於世的巴卡特里亞騎兵之勇敢，極為希臘與羅馬史家所稱許。

這一地方的對外抵抗，不獨對亞歷山大為然。後來伊斯蘭教徒的阿拉伯人，也因這裏特人的抵抗而感到棘手。實際上在其背後是有游牧民族，這種情形自古即是如此。亞歷山大之所以築城塞於藥殺水（錫爾河）之河岸，恐怕也是為了防衛他們而這樣做的。這一城塞名稱的意義，即為在各地所設的亞歷山大式城塞之中位居最遠方的亞歷山大堡壘之意，故名之為亞歷山大烏爾梯馬。據說即為現在之俱戰提。

征服了粟特的亞歷山大大大帝，即以巴卡特里亞為根據地，安置兩萬餘希臘人於此地，於公元前三二七年，向印度西北部進攻。這以來，他便實現了歷史上最初的世界帝國。

不過，這一大帝國，亦因亞歷山大之病歿，而立即化為內亂之甚，而分裂為馬其頓、埃及和敘利亞三國。在此中以在亞洲幾乎原封不動地承受了這份強大遺產者，為塞流科斯科的敘利亞王國。但於公元前三〇六年，於侵入印度時，敗於孔雀王朝之祖旃達羅發多，而不得不放棄自印度河起至興都庫斯山脈地方。縱然如此，但巴卡特里亞、粟特、安息等地，仍確實地成了敘利亞王國的屬地。

在這些地方，有若干城市都因建設者的名字而命名，譬如Antiochia和Selucia等皆是。距阿蘭遺跡不遠的木鹿城Mew（現為阿修哈巴德），乃即在木魯迦布河流域所建築的安梯奧基亞。這塊木鹿綠洲，乃安梯奧科一世救濟者Antiochus（Soer X）公元前一八〇—前一二一年在位）之時，為防游牧民族之侵入，乃將其全域用長城圍起。

正在這時，中國亦有所謂戰國七雄，其中接近蒙古高原的北方各國，也都分別築起長城。這樣纔勉強遏止了游牧民族日趨劇烈的侵略攻擊。秦始皇所造之有名的萬里長城，也無非將此種長城予以加強而已。

摩崖的碑文

公元前三二一年，實現了中國最初大帝國的秦始皇之統一政策，多與大流士大王的政策酷似。他所造成的分為民政、軍政、監察等一種三權分立的政治組織，即其一例。這不過僅屬中國與西亞所實現的歷史發展過程相似而已麼？或者可以斷言這是依蘭文化，所給予中國的影響麼？兩方面可說都有可能。不過，在時間上與空間上，都隔離久遠的法蘭克王國的夏露路馬紐大帝（七六八—八一四年在位），也曾有過模仿大流士大王之故事，實行改革行政組織的事實，所以我總覺得秦始皇的統一政策中，也像有古代波斯帝國的影響。

秦始皇曾屢次巡幸四方，建紀功碑於各地。它們多數都是立石而刻字於其上的。唯有碣石山的刻文，謂為「刻於碣石之門」，故謂之摩崖之碑文，似無不可。印度阿育王的碑文，亦與此相關。

初次統一了大部分印度的阿育王（公元前二六八～前二三二年在位），也在各地基於佛教精神，豎立了表示他施政方針的碑文。多數的碑都是在石柱上所刻，白沙瓦（昔日的犍駄羅）和阿富汗的堪達哈爾，尙都剩有摩崖碑文。在這些石碑的柱頭之上都刻有獅子像，由這石柱的樣式看，無疑它們是受了古代波斯文化的影響。

無論立石的碑文也好，或摩崖的碑文也好，在石上刻碑文，除西亞之外，在阿育王之前，秦始皇帝以前，都未之見。這件事，縱令是部分地也好，在兩世紀之間受到波斯帝國統治的印度，固不必論，即屬中國，若說它也同樣深受伊蘭文化之影響，毋寧說是極為自然之事。

尼薩出土的維納斯

從安梯奧克斯一世（公元前二八〇～前二六一年在位）的治世起，敘利亞王國在伊蘭的支配力量，眼見衰微下來。繼承他的是安梯奧克斯四世（公元前二六二～二四六年在位），他為與埃及的戰爭而奔命，無暇東顧。因此，「巴克拉里亞一千個城市的太守」底奧德特斯，脫離敘利亞王國而獨立（前二五〇年左右），在其子底奧德特斯二世時，遂自行稱王。

與此相前後，獲得達拔族援助的巴爾尼族首長阿爾薩克斯，殺希臘人之太守，建立巴爾提亞王國（公元前二四八～後二二六）。即所謂阿爾薩克斯朝的波斯是也。中國史書上也稱之為安息。

阿爾薩克斯朝之初期京城，似設於阿什哈巴德（舊譯夫梅里）之西一八公里的尼薩。蘇俄的考古學家發掘了此處當年的宮殿、神殿和市街等等。由此發現了希臘科林斯式的石柱，表現希臘諸神的象牙製角形杯，一眼便被人想出來是米羅的維納斯 Venus of Milo 大理石像等，分明都是希臘人之

所製做。不過，在那裏也曾發現了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之阿拉姆文字記錄葡萄酒出納的陶片文書，故從而可知亞克美尼朝以來的文化傳統，並未斷絕。

阿爾薩克斯在位二年而死，由其弟底里達特斯（公元前二四八～前二一四）繼承王位。他與塞流科二世（前二二二～前二一五）的遠征軍戰而敗北，逃亡於薩迦族的住地。不久又死灰復燃，再將敘利亞王國逐至美底亞以西，打下了伊蘭建國的基礎。還都城於赫卡特姆底羅斯（有一百個城門的都市之意）。赫達之地點，推測當在沿耶爾魯魯斯山脈的南麓，橫貫伊朗高原交通路上之要衝達姆干附近。

以復興敘利亞王國為職志的英主安梯奧克斯三世（公元前二三三～前一八七在位），首先征服安息王阿爾塔巴奴斯一世（公元前二二一～前一九一左右在位），隨後又討伐了他的盟友巴克拉里亞王耶烏提達姆斯。耶烏提達姆斯是殺底奧德特斯二世，奪取王位的人物，他頑抗不屈，以致安梯奧克斯也不得不承認其獨立，而與之講和。

耶烏提達姆斯的勢力，從他的貨幣之分布狀態來看，似乎不僅限於巴克拉里亞和粟特，已達到與都庫什以南了。公元前一九〇年左右，繼承耶烏提達姆斯王位的得梅托里奧斯 Demetrius，征服了自喀布爾起，包括旁遮普在內的印度西北地方。

巴克拉里亞的希臘人，就這樣統治了印度各地方，然印度西北部見到希臘文化之影響，乃自此時開始。巴克拉里亞王國，更有向帕米爾以東發展的迹象。不過，在其後之公元前二世紀中葉以後，巴克拉里亞的希臘人，已退至與都庫什以南，僅得苟延殘喘。其原因之一是由於安息的顯著發展。面臨最盛期的安息，它的領土由幼發拉底斯河，擴展到印度河。可是直接決定巴克拉里亞命運者，乃越過藥殺水南下之游牧民族的侵入。據斯特拉波說，「掠奪（在內亂狀態）之巴克拉里亞者，為阿西歐伊、帕西阿諾伊、托哈洛伊、薩卡拉烏洛伊等康居人的四個部族」。中國最初通西域的大旅行家，聲名顯赫的張騫，探訪巴克拉里亞，即為其後不久之事。（待續）

恰克圖市況商情回顧

沈咸恒

恰克圖在外蒙古土謝圖汗部之北，與俄屬西伯利亞接壤，早在前清乾隆年間，中俄貿易即頗繁盛，亦為蒙境商業重鎮，在庫倫之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俄方內亂，對華、蒙貿易，幾陷停頓，恰克圖之商市情況，因之衰落，昔日盛況，尙值回憶！

恰克圖於中俄訂約之後，闢為商埠，並將恰克圖舊城，劃歸俄國，於其南

增闢一城，即所謂「買賣城」，圍以木柵，城內有南北通衢，東西有橫街兩條，街衢均甚短，東、西、北三城門之外，均空曠，無居民商肆，僅南門外，有一商墟，白日集為市場，傍晚即散去成為一大空曠之地，邊沿有商肆居民，尙稱繁華。買賣城與恰克圖之名不分，茲篇所記，即恰克圖之買賣城部份。

恰克圖為中俄互市之區，外蒙古社會，其時無工商經濟可言，完全居於消

費者之地位，俄國貿易以西洋貨為主，因鐵路運輸便利，又有河流通達烏金斯克，運費低廉，頗佔上風。中國貿易，以張家口為起點，經漫長草地，必須以駱駝組隊而行，運輸時間，多達一月之上，有二、三月始達者，頗為不便。

清末，有戶部銀行設分行於庫倫，旋改為大清銀行，民國成立，即以原址設中國銀行分行，旋以恰克圖設分支機構，原名為匯兌所，旋改稱為支行。俄境有華俄道勝銀行之分支機構，曾為避紅軍入境，亦遷至買賣城營業，直至全蒙陷。貨幣通用俄鈔，即俄國之盧布紙幣，嗣因中國銀行發行鈔票，在外蒙境內不兌現，券上印明張家口地名，至張家口始行兌現，此券流通以後，亦正值俄之盧布大跌，後竟至不能維持，俄鈔始不通行，俄鈔票面有一、三、五、十盧布之分，最高者為五百盧布，印刷尚精良，後以內亂，濫發貶值，票面逐漸增加至一千及五千盧布，最後每券竟增至一百萬盧布，紙質粗劣，市面乃絕跡，此消彼張，中國銀行券乃盛行，即附近俄境亦通用。

買賣城之木柵內，有中國駐恰克圖之都護副使公署及其衛隊，有蒙古地方官署，有關帝廟，有商會，有俄人商號及山西幫大商號、山東河北各地商號，以山西幫執牛耳，都以經營布疋雜貨為主，蒙古各地方之消費，都取給於此，貿易額頗鉅。更有一種行商，名曰「老客兒」，配好各種物品，僱一馬車，載之以行，沿途與蒙人交易，愈深入，則收益愈豐，有以金銀珠寶皮草名貴藥物如鹿茸麝香等交換者，利益之大，難以估計。有的老客兒跑二、三次，即已發財，平時住恰克圖客棧，食宿於此，潤綽有甚於店東。

蒙古王、公世譜

(譯自蒙古地誌上冊)

一、屬於達延車臣汗系統的諸部為：敖漢部、奈曼部、烏珠穆沁部、浩濟特部、蘇尼特部、巴林部、札魯特部、克什克騰部、喀爾喀左右翼部、唐古特喀爾喀部、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右翼部、歸化土默特部、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音諾顏部、青海喀爾喀部。按達延車臣汗為成吉思汗第十五代孫。

一、屬於哈薩兒系統的諸部為：科爾沁部、札賚特部、杜爾伯特部、郭爾羅斯部、阿魯科爾沁部、四子部落、烏喇特部、茂明安部、阿拉善領魯特部、青海和碩特部、珠爾都斯和碩特部、新和碩特部、察哈爾附牧額魯特部。根據歷史記載——拙赤合撒兒乃成吉思汗之親長弟。

一、屬於「賚楚肯」系統的部落為：翁牛特部。根據歷史記載——帖木格幹惕赤斤乃成吉思汗之親四弟。

山西幫有十大商號，均有名聲，以大盛魁為首，其衰落亦以大盛魁為始，此十大商號，均遍設於西口、北口，業務繁盛，大經理每多吸食鴉片，或以待客，舒適優裕之生活，為人所欣羨，服務愈久，則所享之福利愈多，有「入股分紅」制，以酬其勞，彼時大多係獨資經營，管人富有，商肆更為獨資設立，所謂「入股」，係乾股，實際不出資，亦謂之「身股」，最初吃一釐身股，多則二、三釐，很少有上分者，經理身份地位，亦視吃身股之多少為次第。所謂「分紅」，以本號全年之盈餘，視吃身股若干為準，如身股吃三釐，可獲盈餘總額百分之三，為數頗為可觀，足以獎勵鼓舞員工人心，法良意美，亦足為今日之企業家借鏡，今日盛倡提高工人福利，此「入股分紅」辦法，足為參考。經理人，多山西籍人，入股分紅，積有鉅款，在山西之東家，即在經理人山西原籍，建屋購田，俟經理人三年給假歸籍之日，則已宅已高樓大廈，富麗堂皇，不識為己之家矣，假滿離欲久留，而不可得，必須如期返回外蒙之本號，終其身不可得數次歸。

所謂「北口」，係指張家口以北之外蒙古各商埠，商場結帳，不以端午、中秋、年三節計算，北口一年分四期結帳，稱為「標期」，其重要一如年節，全年分四、七、十、十二月四次，所有帳目債權債務，每標均須結清，必要時以現銀現款運送抵還，運送此項銀款，謂之「標銀」，運送時謂之「走標銀」，必須有人護送，謂之「保標銀」，今人一般謂之保鏢，按鏢為武器之一名，似此或許以保鏢之意義為正確耳。

原著柏原孝久
烏尼吾爾塔譯

一、屬於「伯勒博格德依」系統的部落為：阿巴噶部、阿巴哈納爾部。史記別勒古台乃成吉思汗異母弟。

一、屬於「濟拉瑪」系統的部落為：土默特左翼部、喀喇沁部。史記者勒蔑乃成吉思汗之臣。

一、字罕乃成吉思汗之臣，屬於其系統的諸部為：杜爾伯特部、青海綽羅斯部、三音諾顏附牧額魯特部、札哈沁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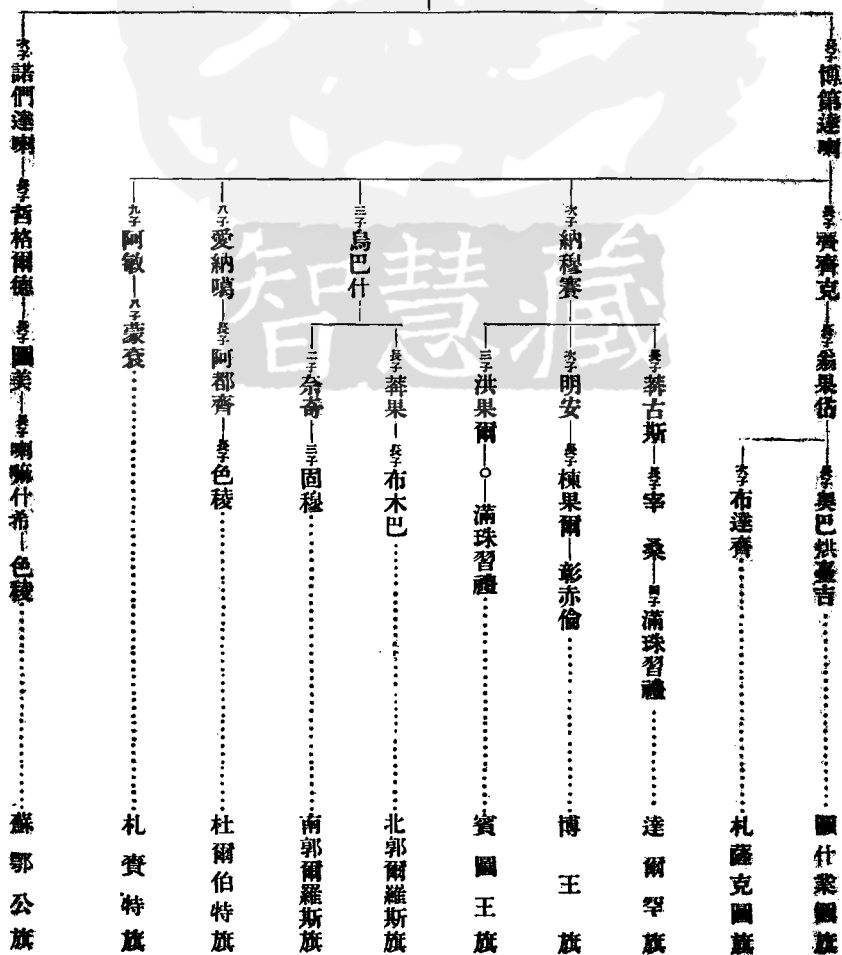
一、札巴甘墨爾根乃成吉思汗之臣，屬於其系統的諸部為：札薩克圖汗附牧輝特部、青海輝特部、杜爾伯特附牧輝特部、伊克明安部。

一、翁罕乃成吉思汗之臣，屬於其系統的諸部為：舊土爾扈特部、新土爾扈特部、額濟納土爾扈特部、青海土爾扈特部。

附蒙古各盟部旗王、公世譜表於后：

(一) 內蒙古哲里木盟各旗

成吉思汗長弟拙赤合撒兒第十三世孫圖美尼雅哈齊——奎蒙克塔斯哈喇



元臣札巴甘墨爾根——巴桑——黑龍江伊克明安旗

(二) 內蒙古卓索圖盟各旗

成吉思汗功臣者勒篥 — 脫魯忽察兒 — 和通 — 格爾博羅特 — 格爾勒泰 — 宰桑 — 恩克 — 長昂 — 擺洪太 — 烏蘇布達 — 喀喇沁右翼旗

烏丹偉徽 — 喀喇沁中旗

莽古岱 — 善巴 — 土默特左翼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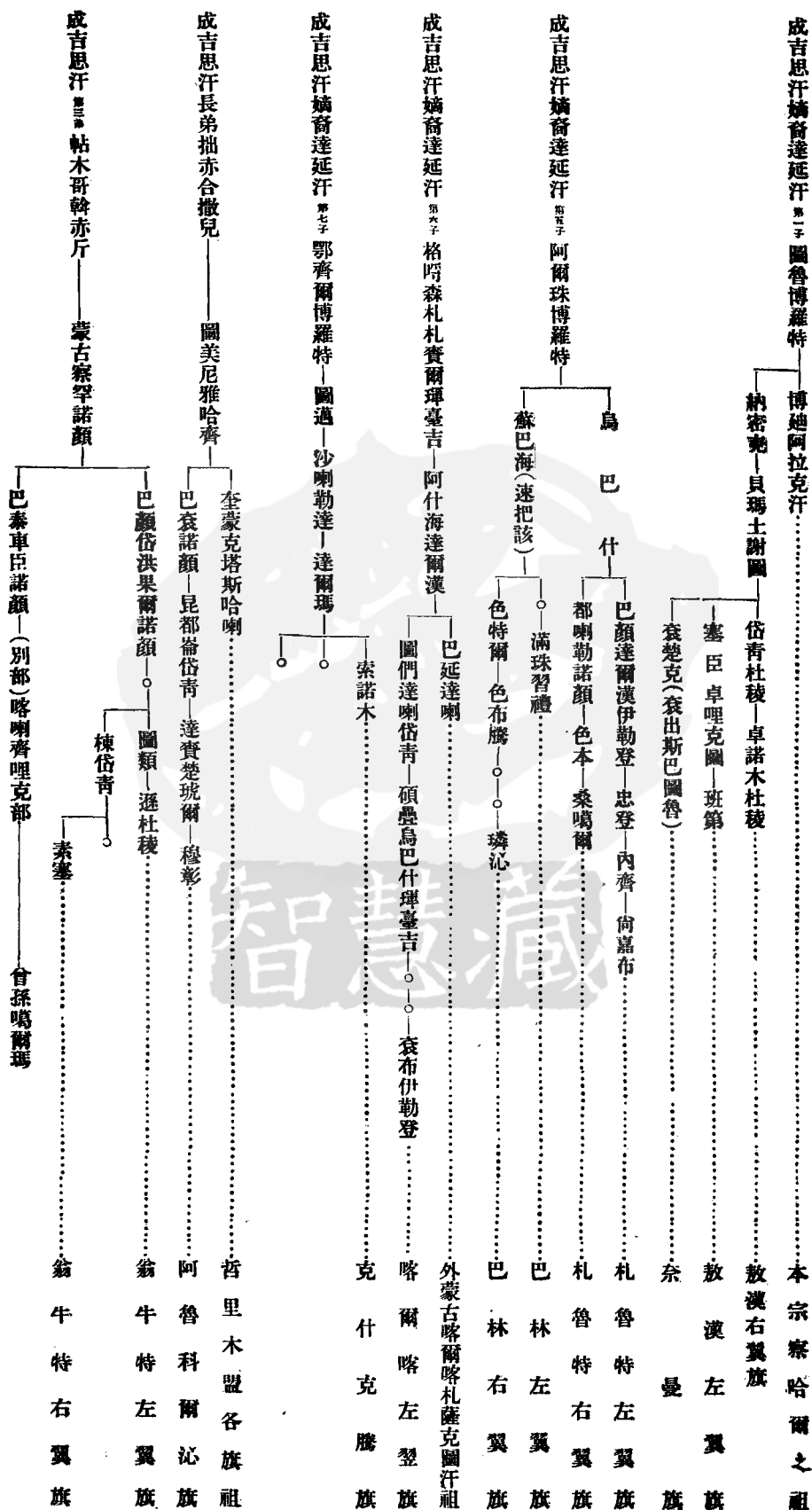
圖魯巴圖爾 — 圖琳固英 — 色稜 — 喀喇沁左翼旗

成吉思汗嫡裔達延汗_{第三子}巴爾斯博羅特_{第三子}阿勒坦(俺答) — 愛辛臺吉(黃臺吉) — 裔孫噶爾圖 — 鄂木布楚琥爾 — 固穆 — 土默特右翼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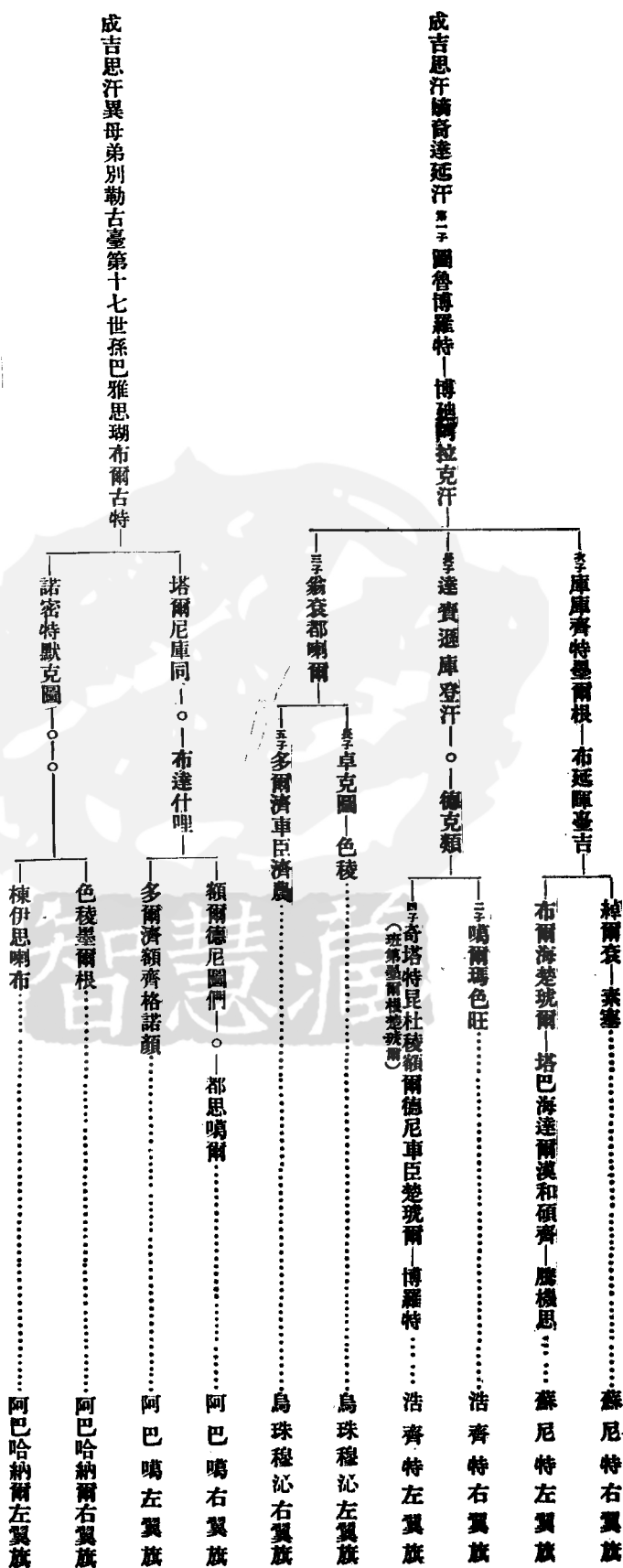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之裔 — 巴勒布冰圖 — 喀爾喀旗

(系統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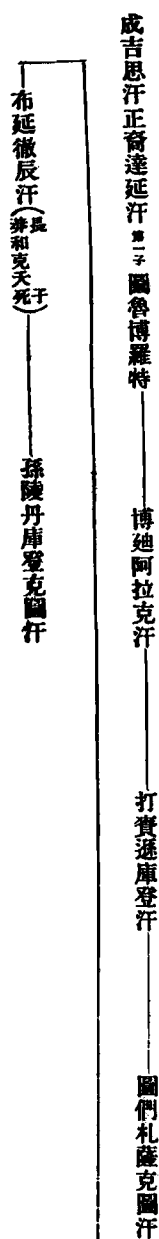
(三) 內蒙古昭烏達盟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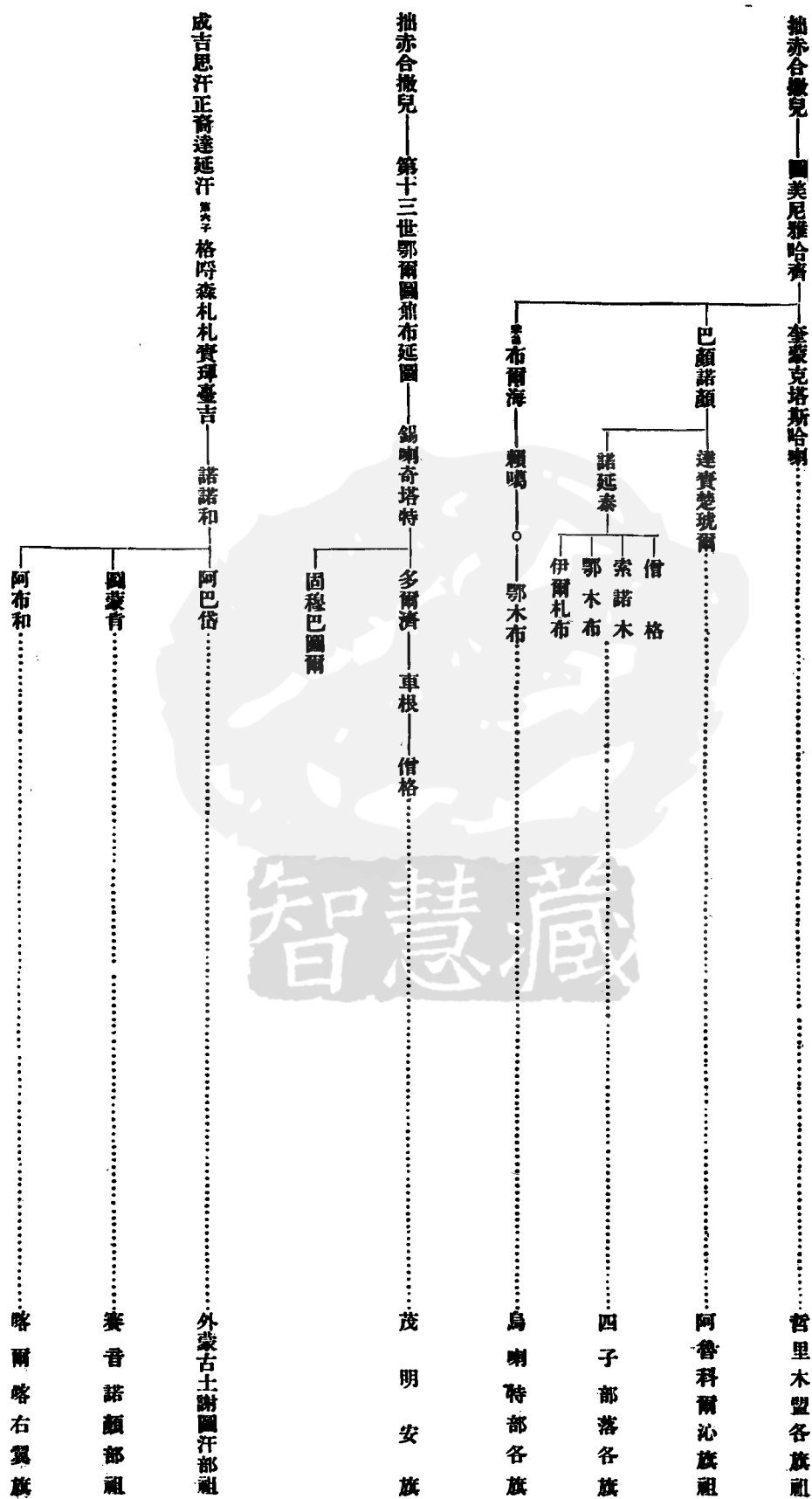
(四)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各旗譜系



(五) 內蒙古察哈爾部譜系



(六)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各旗



(七) 內蒙古伊克昭盟各旗

成吉思汗正裔達延汗（子）巴爾斯博羅特（子）衮必里克圖圖魯根（子）吉囊

諾顏達喇濟農。博碩克圖額琳臣

拜桑固爾
雅達爾瑪
諾木塔爾尼
布揚古寶
班札喇
巴特瑪撒巴幹
阿穆爾達喇
鄂克拉罕

智慧藏

色稜……………左翼前旗
沙克札……………左翼後旗
善丹……………右翼中旗
額琳沁……………右翼前旗
小札木素……………右翼後旗
定咱喇什……………右翼前末旗

(八) 內蒙古歸化城土默特部

成吉思汗正裔達延汗^{第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第三子}阿勒坦(俺答)——博領克圖……………歸化城土默特二旗

(九) 外蒙古喀爾喀四部

孝阿什海達爾漢輝臺吉——巴顏達刺——賽瑚爾汗……………札薩克圖汗(十八旗)

三子諾諾和偉徵諾顏——阿巴岱——察琿多爾濟……………土謝圖汗(二十旗)

成吉思汗正裔達延汗^{第六子}格爾森札札賽輝臺吉——^{五子}阿敏都喇勒——謨羅其瑪——碩壘——烏默克……………車臣汗(二十三旗)

阿巴喇之弟圖蒙肯——善巴……………賽音諾顏部(二十二旗)

鄂特歡諾顏……………青海喀爾喀(一旗)

巴延阿布該阿玉什

阿拉善額魯特一旗

(附子)

青海綢緞特二十族

拉藏汗

附牧塞哈爾額魯特

昆都倫烏巴什——多爾濟

珠爾都斯和碩特三旗

蒙我……

.....新和碩特一旗

元臣索罕第六世孫額森（也先）

● 博羅訥哈勒

杜爾伯特十四旗

額斯墨特達爾漢諾顏

賽音諾顏附牧額魯特

七世孫巴圖爾琿臺吉

青海綽羅斯二旗

—(系統不明)—

吐京緯羅斯

—(系統不明)—

札哈沁一旗

元臣札巴甘墨爾根

(第十二世孫)

達什色布騰

班珠爾—達瑪璜

.....杜爾伯特附牧輝特下前旗.....

羅布麻——袈裟

同下後旗

(系統不明)羅布藏—噶爾丹達爾札

札薩克圖汗附牧輝特一旗

(系統不明)——**細木占**

.....青海輝特一族

元臣翁罕第十七世孫貝慕鄂爾勒克

珠勒托幹鄂爾勒克。書庫爾岱青。

阿玉齊。

烏土爾扈特十旗

新木爾薩

額濟納土爾扈特一旗

雅衣寧布齊 第六世孫舍稜

新土爾扈特二旗

保蘭阿噶勒琥。索諾木喇布坦

青海土爾扈特四旗

拜海

博第蘇克

註 本世譜係參照蒙古源流、四夷考、藩部要略、蒙古王公統傳、蒙古王公表傳、大清會典、蒙古遊牧記等編成。

編後記

編者近因目力衰退，加以手指關節腫痛關係，亟需讓賢，月前已向本會懇辭，並蒙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另請本會其他同仁接替，嗣以向政府主管機關變更登記發生困難，在此期間，工作不容停頓，故不得已於職務交卸月餘之後，經同仁敦促，暫時再做馮婦，然在編輯與出版方面均為之遲延一個月之久，抱病從公，情非得已，尚乞讀者見諒！

本期內容着重於帝國主義侵略外蒙之經過，以及外蒙在俄帝擺佈下，共黨肆虐情形，旁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外蒙在工農業方面之活動狀況，尤以林佩晉先生所譯「俄帝赤化下之外蒙」一文，對外蒙現狀鞭辟入裏，頗值參考。外蒙原為一遊牧區域，農工商業本均無足紀述，但自其成為俄帝之傀儡後，在工業方面若小手工業改為動力操縱，然無庸諱言，俄帝援蒙「並非基於仁愛友善的原因，而是決定要在西伯利亞的南方邊境，培植一個忠實、而政治目標一致的衛星國家」。自然也是為的培植或開發一個榨取資源、徵用勞動力的對象。譬如在二次大戰中，軍中防寒裝備，均仰賴外蒙製造，一部分作戰騎兵，亦自外蒙徵調，就是明證。

外蒙共黨竊奪政權之後，殺戮清算，手段狠毒，至為酷烈，王公喇嘛地主們統遭清算，一切財產悉被充公沒收，「其作風與從前的蘇俄情形一樣」，天下烏鴉一般黑，不幸也與後來居上的中國共匪作風一樣。中國共匪當然無須向外蒙共匪學習，因為事事都向蘇俄「一面倒」，一切聽蘇俄顧問指揮，一切以蘇俄作榜樣，所以做起來祇有青出於藍，絕無「過猶不及」之處。總之共匪的作風就是那一套，起初無論怎樣甜言密語，一旦政策決定，一切同志、同路人或要好的朋友，都立刻變成了他們的刀頭之鬼。看看這篇文章的內容，人們不難發現，自一九一七蘇俄「革命」之後，經過外蒙的赤化，和中國大陸的赤化，甚至於包括中南半島三國淪亡後的現狀在內，各國或各地共匪的作風，前後實如出一轍，毫無二致。人們倘若不信，甘心再上賊船，那就真所謂自作自受，不必再怨天尤人了。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簡介」，也是一篇極有價值的報導。國人對中國邊疆問題之模糊、忽視，已到極點，一般人對邊疆問題之不了解，猶可諒解，政府有關機關之有欠積極，則殊足令人沮喪。現在政府為人民謀福利之事，不一而足，惟對培植、儲備、任用邊疆人才或政大民族社會學系畢業學生，終似不太熱心或一籌莫展，坐令這一國立學府的這一科系之師生，感覺前途茫然，能說這不是國家的不幸，或政府的重大損失麼？怎樣給予賢明而合理的輔導與解決，是則有待於大有為政府的積極展佈了。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五十八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